



2011 年 3 月 31 日 4 期

总第六十九期

2008 年 9 月 13 日创刊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革研究

“拾荒者”专辑

说明：这是我们为任冬林先生编的个人专辑。十多年来，任冬林与真正的拾荒人一起在废品回收站辛苦忙碌，抢救下一批批珍贵的史料。其中尤以文革基层史料和知青史料最为可观，它们以“原生态”的形式记录着文化大革命中街道、农村、工厂的基层政权如何“以阶级斗争为纲”实行“全面专政”，从中可以清晰、具体地看到不同类型的底层民众在当时的生存状态、思维习惯甚至特色鲜明的时代语言，具有多方面的研究价值。在国家档案拒不依法解密的情况下，任冬林以自己的远见卓识和辛勤劳作，为抢救底层史料、保存民间记忆、推动民间研究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记忆》谨以专辑的方式向这位特殊的“拾荒者”表示敬意，并希望任先生的精神、事迹对学界有所启示。

本期目录

【本刊特稿】

任冬林 我的“拾荒路”

附录 1 燎原（吕仙亭）居委会文革资料篇目

附录 2 方元大队文革资料篇目

附录 3 其它文革资料部分篇目

【史林一叶】

任冬林 一个居委会的知青上山下乡动员史料

任冬林 一个“特嫌”老人的十二份交代

任冬林 一个 16 岁少女的“家庭出身”档案

任冬林 地主父亲原来是抗日烈士——外调中的意外发现

【故纸堆】

[任冬林整理 一个城镇贫民对“单干自发”的交代](#)

[任冬林整理 一个乡镇理发师的检查交代](#)

[任冬林整理 一个家庭妇女的历史交代](#)

[任冬林整理 一个“反革命子弟”的检讨书](#)

[任冬林整理 一个“地主分子”的交代](#)

[任冬林整理 一个“摘帽右派”的交代](#)

[任冬林整理 一个“四类分子”的投案请罪书](#)

【编读往来】

[1、阎长贵谈陆小宝文](#) [2、蒋健谈《回味“九一三”》和《康生的另一面》](#)

[3、吕正谈 67 期林达的文章](#)

【本刊特稿】

我的“拾荒”路

[任冬林](#)

1999 年，因命运的安排，我不得不提早十年结束了正式的工作。当时我的独生子十四五岁，我已年届五旬，我不得不拿出不多的积蓄（八千元）到股市去一搏。这是小孩少得可怜的“长大”钱，我得伺机而动。可怎样动，心里没底。出路在哪里？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迷茫。

正当我不知所措时，在报上看到了一篇文章——“文革文物值万元”。当时虽不以为然，但给了我重大的启示——大城市的民间收藏热已悄然兴起，我所在的城市也有些人搞起了收藏。恰好这时我市老城区改造，居民大搬家，“垃圾”多多，天赐良机。

我来到本地废品收购店、旧货市场寻找机会。

在坐等股市收益的同时，我也收获了“变废为宝”的乐趣，心里的压力逐渐得到了缓解。当时的废品店、旧货市场确实有一些好东西。看到一些七八十年代出版的崭新的连环画，很有文献价值的线装书等就这样轻易被人弃之，我真替原



主人惋惜。我庆幸自己的这一选择，看到了这里是一座尚待开发的无形宝藏。

久而久之，我逐渐萌生了收藏的念头，鉴于自身的条件，我决定把重点放在收藏中国近现代史的民间老照片和破纸片上——它们是我国近现代社会发展变化的历史见证。

2008年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四十周年，2009年又恰好是建国六十周年，我搜集的有关资料恰逢其时。为了便于对外介绍，让更多的研究者了解这些收藏，我动了用电脑的念头。当时我的家庭遭遇不幸——我再婚不久，继子即出车祸，亲子还在长沙读书。经济窘迫，我厚着脸皮向五位亲友开口，才借到买电脑的三千元。这笔债务，我将用六十岁生日所收的礼金来偿还。

学会电脑后，我就夜以继日地将收藏的史料一篇篇作文字录入和原件扫描（拍照），编成电子文本。2008年6月28日，我在人民网开博，陆续将我的这些收藏和研究成果发到网上。

一天，一帧带底壳的老照片映入我眼帘，我眼前一亮，照片上明明是位身着清式服装的中国男子，而底壳背面铜版印刷的却是外国艺术图案和文字。我将这一件藏品取名为“海参崴中国男青年”。我想，这样的老照片没有专家学者的鉴定，就只是一张极其普通的老照片。于是，2007年3月4日，我揣着它上长沙，来到省文物局，文物局的领导给我介绍了我省这方面的专家。于是，我到省博物馆找到了欧金林研究员，欧金林研究员相当平易近人，他马上就认定了这张照片的价值，并嘱咐我拿到报社去发表，临走还送了我一张博物馆免费参观券。有了专家的介绍，3月7日的《长沙晚报》就以《百多年前的“外国”老照片》为题对此照片进行了报道，文中称：“（湖南）省博物馆研究员欧金林仔细看过这张照片后指出，该照片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2008年，好几家大型媒体为纪念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四十周年征集史料，但是他们所征集到的只有一些零星、重复的资料。我是六八年的知青，自然想在这方面有所收获。一次偶然的机会，我拾得一宗四十年前以我地农村方元生产大队为单位，时间跨度十二年，涵盖了整个十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知青集体的史料。2009年我在博客上发表有关消息后，引起研究知青运动的专家学者们的高度重视。2009年8月25日，团中央青运史档案馆给我的一封回复说：“您收集的知青资料很珍贵很难得，望妥善保管，将来必将会有大用场。”2009年12月11日，与

我素昧平生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知青史专家刘小萌应邀专程来我家翻拍了这些资料。

我收到的这套知青史料之所以能成系统并有幸留存下来，我想完全在于它独特的形成和流传经过：当年该大队分管这方面工作的负责人显然认识到它的价值，注意进行了整理、分类，收集保留下来；改革开放后这套史料随它的主人一同进了城；因某种我不知道的原因被他的家人送进了废品店（幸而没有以其它方式处理）；最终被我有缘碰上并及时从废品堆里抢救出来……其中，任何一个环节的缺失，这套知青史料都将不可能留存于世。

有一段时间，我的这方面收藏真可谓“如贫得宝，如暗得灯，如饥得食，如旱得雨”。这要得益于自己经过上山下乡多年的磨练，已养成不怕脏、不怕苦的习惯，并时常能设身处地为这些从农村来城市开拓废品旧货市场谋生的“拾荒”人群着想。在这个时期，“社会生产、生活和物质条件迅猛改善，近现代历史上各类具有重要价值的实物资料加速灭亡”（国家文物局关于印发《近现代文物征集参考范围》和《近现代一级文物藏品定级标准(试行)》的通知），正是由于他们默默无闻的劳动，为抢救、保留许多珍贵的实物资料做出了特殊的贡献。我和他们彼此间建立起了一种相互理解、十分融洽的关系。

那一段时期，我几乎与这些拾荒人同吃、同住、同劳动。昏暗、狭小、齷齪的废品仓库成了我整日待的地方。困了，我就和衣在废品堆上小憩一会儿；渴了，就对着水龙头“咕隆”上几口；吃饭就跟他们同一口锅，废品店老板忙不过来的时候我一定会抽身前去帮助。我并不感到苦和累，完全到了忘我的境界。每每翻到一些有价值的东西，特别是翻到一些难得一见的纸质“废品”，那种喜悦之情真是难以用言语来表达。晚上睡觉的时候，心里还在盘算着，我的系列收藏还差哪方面的资料……

特别是当我在废品堆中发现了本地燎原居委会的一套文革时期史料后，那种惊喜真是难以描述。那堆“废纸”被我以一百元买了下来。当时我鳏寡一人，独自承担着孩子的抚养责任，经济十分拮据，这一百元是我在买这些“废品”中出手最高的一次。

2000年的12月份，得知武汉市政府在一偏僻地带开辟了一个周末开放的临时跳蚤市场，我就在一个星期六的一大早特意赶去。举目一看，真可谓人头攒动，

热闹非凡，但秩序出奇的好。摊贩们在各自的地摊上铺开报纸，摆上他们收来的藏品出售。一整天的刻意搜索，我没有发现什么有价值的藏品。转到下午两点多，我看见一位五十开外穿一身黑衣裳的瘦小男子伫立在街边一头，手里只拿着一个牛皮纸袋，但他没向任何人兜售他手中那包东西。我上前询问后取出一看，原来是文革期间的一摞个人书写的文档材料，我没还价，15元钱便买了过来。回家一摆就是九年。不久前得暇整理，这才知道它是文革中长航武汉分局一造反派人士在“三查一清”运动期间进学习班后的相关材料，及长航武汉分局对其一位极其普通的“历史复杂”员工的大量调查取证材料。

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晃就是十多年，如今，我小孩已大学毕业，我也度过了经济难关，我的收藏也成了系列，从1860年至1997年一个多世纪中国近现代各个时期的史料均有涉及。

经初步整理，在我这些资料中有：

我市湘阴军民英勇抗日的《守土日记》；“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渡江老照片；《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政策》……

新中国建立后，一个县的教育资料；“镇反运动”时期“为政治土匪某某一案奉令判处死刑解交你区执行”的执行令；建国初期中共党员入党志愿书；反映近代著名老字号企业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全过程的实物凭证；建国初期的聘书、结业证书；1958年为发扬中国共产党密切联系群众、艰苦奋斗优良传统的一个制度上的规定：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日记……

一份见证社会大变革，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期的包干到户合同表；反映改革开放引起服饰变革的一组老照片；一组岳阳楼老照片……

与文化大革命相关的史料是我的收藏重点。因为，文革是以革命的名义进行的一场背离人类文明和普世价值，影响深远，必将成为历史学家深入研究的空前“浩劫”！

我收藏的文革文献资料，都是我家乡最基层单位一些初识文化或纯文盲请人代笔写下的，绝大多数为底层民众在那场运动中的集体记忆。它由我地文革期间一个居民革命委员会、一个农业生产大队、一家工厂，四大国营农场及本地社会零星材料组成（外地的大约占3%）。该资料经我初步整理成文一百二十篇，成文文字大约在五十万字，这些资料的留存，为解剖和研究这些社会细胞在文革中的

状态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材料。

2009年4月16日晚，我省资深的老档案专家、档案馆副馆长见我2009年前发在人民网强国博客上的资料文后，给我发来邮件：

……真正有价值的当是您的那些“物”，即那些破旧的纸片儿。因为这些东西恰巧是国家档案馆不太注意收藏的死角，一般的人也不太注意保存，用了也就没了，有了您的收藏，给我们留下了已逝岁月的记忆，许多生活细节得以再现。也是民生档案的一部分吧。其主要价值不在金钱多少，不在凭证作用，而在文化价值方面。请您善待它们。

2009年，人民网强国博客公共网页“庆60周年老物件征集作品选登”上凡注明“寻梦者”的，就是我的应征藏品和著文。没想到，经相关人士投票产生的结果，最热老物件图片库（1—6名）和最受关注老物件排行榜（1—8名）全是我的。

（见 <http://www.people.com.cn/GB/60833/156932/170156/index.html>）

2010年，我通过朋友介绍与研究中国知青问题的法国学者潘鸣啸先生联系上，他看了我介绍收藏的知青史料的文章后，给我的回复说：“我对这些档案很感兴趣。我给您介绍了香港中文大学的民间记忆网站，比较适合保留这些档案的电子版本。”随即，民间历史网站与我取得了联系，我给他们发去了几篇介绍史料的文章，很快就收进了他们的网站。

我这十多年的艰辛“拾荒”路，没有想到竟起到了抢救、保护“文化遗产”的作用，实乃人生一大幸事！随着我对这些收藏到手的“废品”的整理和研究，对它们的价值有了更多、更清晰的了解，对自己的那段苦行僧似的“拾荒”生涯也就更加感到欣慰和自豪。虽然“拾荒”并未使我发大财（反而还因长时间无序的生活使健康受到损失），但是我得到的收获毕竟是有益于社会，有益于历史和后人的，我深信，我的这些收藏品，在今后的历史、文化、社会研究中将会起到一些有价值的作用。

附录1——

燎原（吕仙亭）居委会文革资料篇目

任冬林整理

吕仙亭，原名吕仙道观，始建于唐末。相传吕洞宾曾三次到过此地，用仙丹救活老树精，并炼蛇为剑，为民除害。后人为纪念吕洞宾，在此建起了吕仙道观。吕仙亭位于洞庭湖畔，远处君山、扁山尽收眼底。经历代发展演变，到中共执政时，一狭长的麻石板街道已十分繁荣。

按新中国的体制，吕仙亭的街道居民也被组织起来，这条街道就有了基层政权组织：吕仙亭居民委员会。

据记载：“吕仙亭居委会位于先锋路与吕仙亭之间，靠近火车站和轮船候船室。全会有居民 347 户，1056 人（“纯居民 125 人，平均年龄 60 多岁。其中聋、哑、瞎、跛、重病的有 21 人，70 岁以上的 19 人”）……共有四类分子 16 个，其中反革命 11 个，地主 3 个，坏分子 2 个。全会设十个小组（分四个片），成立有婆婆组，学生宣传队，民兵组、卫生组、房产组、治安委员会等各种组织，样样齐全。共有组长以上的人员 42 人，团员 2 人。”

1966 年，吕仙亭居民委员会及其所辖居民也被卷入了文化大革命。在“破四旧”高潮中，吕仙亭居委会被改名为“燎原居委会”，1968 年，在“全国山河一片红”的夺权高潮中又建立了“新生红色政权”燎原居民革命委员会。

现经笔者从废品回收站抢救下来的燎原居民革命委员会文革资料，主要有以下篇目——

1. 燎原居民革命委员会 1969、1973 年度工作报告（20 页，10255 字）
2. 燎原居民革命委员会第一届新生领导班子的建设（24 页，7289 字）
3. 燎原居民第一届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档案材料（16 页，3263 字）
4. 燎原居委会 1966—1974 年居民系列登记表册（28 页，7680 字）
5. 燎原居委会城镇知识青年 1968—1977 年上山下乡动员系列材料（29 页，14098 字）
6. 燎原居委会城镇居民 1969 年下放运动系列材料（12 页，6807 字）
7. 1968 年后历届辍学留城知青招工系列材料（15 页，6807 字）

8. 寓居燎原会下放干部要求治病的报告、病历及其他干部家属的申诉书等资料（21 页，7069 字）
9. 有关一被招工知青的生父、继父、母亲相关取证材料（15 页，7421 字）
10. 燎原居委会女性居民自传中解放前苦难回忆摘抄（30 页，15741 字）
11. 燎原居委会男性居民自传中解放前苦难回忆摘抄（26 页，8483 字）
12. “要准备打仗，必须扫除障碍”——城关镇城南革命委员会派出的驻燎原居民革命委员会毛泽东思想工人宣传队关于燎原会当前形势的会议纪要（4 页，1118 字）
13. 女性居民中一位文化程度最高者写于“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的“一生求解放”的自传（4 页，1796 字）
14. 一组织关系临时安放在燎原会的革命老人写于“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的自传（10 页，3033 字）
15. 有关一地主女儿的父亲是“视死如归的抗日英雄”的旁证材料（10 页，4158 字）
16. 一个剃头匠经四次进学习班强迫学习后的认识交代（8 页，4386 字）
17. 一个 75 岁老人要求“退休”（不再参加强迫学习和监督劳动）的申诉（16 页，6651 字）
18. 一位被通知参加学习班的老汉的质疑信（5 页，1795 字）
19. 两学员在 1971 年元月份学习班上的学习心得（9 页，3457 字）
20. 一位当过“壮丁”的居民的自传交代（8 页，3324 字）
21. 一位因抽签被抽中两次任过日伪保长的居民系列交代查证材料（9 页，4347 字）
22. 广州一居民欲将祖父母接到广州居住的申请及燎原居委会的“不允许”回复（8 页，4661 字）
23. 一位当过妓女的居民五份不同笔迹的自传（3 页，1188 字）
24. 七姨妈有关“义结金兰”的被检举揭发材料（3 页，1842 字）
25. 一个一直没有明确“家庭成分”的居民有关“三个丈夫都是贫下中农”的申诉书（5 页，2541 字）
26. 一女性地主分子 1966 年的改造规划书（2 页，973 字）

27. 一个“生活史上有过四个丈夫”的女性居民的自传（7 页，3140 字）
28. 一个 16 岁少女为证明自己“出身好”发信索要的证明材料及有关信件、批示（7 页，3364 字）
29. 一女性居民为丈夫解放前购置的土地问题进行辩解的交代材料（9 页，3038 字）
30. 燎原居委会要求给一女性居民（“漏管的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小老婆”）戴上坏分子帽子的报告（12 页，字 6653）
31. 有关“历史复杂，一时又无法查证，应在内部作 21 种人控制”的居民的综合材料（9 页，4425 字）
32. 燎原居委会一些年轻居民入团、参军、当民兵、招工的申请书（12 页，5752 字）
33. 一学生因“政治思想及作风错误”被处置回家后的万言入团申请书（12 页，7595 字）
34. 有关居委会三组阶级斗争表现的会议纪要（8 页，4793 字）
35. 八小组居民谈情况（5 页，2191 字）
36. 一女性居民的检举与被检举材料（6 页，4697 字）
37. 一居民有关“单干”错误的认识交代（4 页，1691 页）
38. 一居民档案袋中的检举揭发材料（5 页，3227 字）
39. 一居民的被检举揭发材料（2 页，790 字）
40. “一个十分熟知他的情况的人”的检举材料（4 页，2839 字）
41. 认定一居民为“定时炸弹”的检举材料（4 页，1834 字）
42. 燎原居委会要求对一居民处以极刑的综合材料（4 页，1618 字）
43. 有关“资产阶级分子”朱某的情况综合（5 页，2098 字）
44. 一居民对“无意中把毛主席的像甩下楼去了”的请罪书（2 页，678 字）
45. 几份跨省协查当地解放后失踪人员的通知书（6 页，1759 字）
46. 对一“提破篮配破碗诉苦把身翻”的女性居民的群众检举材料（61 页，11074 字）
47. 一位即将离会居委会干部“关于近一段工作情况的汇报”（3 页，1485 字）
48. 数十位“顽劣儿童”的检讨书（11 页，5298 字）

49. 燎原居委会 1975 年春节期间安全保卫工作规划书（5 页，1007 字）

50. 燎原居委会居民交代自传摘要（12 页，6431 字）

附录 2——

方元大队文革资料篇目

任冬林整理

方元大队是一个以方姓农民为主的农村基层单位，有 8 个生产小队，154 户人家，586 口人的大队。地处丘陵地区，以种植大米为主。1968 年年终分配决算方案表上显示当年每十分工值平均 0.447 元。

（以下资料中的人名均为化名）

1. 1969 年 4 月 13 日被遣送回方元大队的方□□的综合材料（6 页，3508 字）
2. 方元大队新屋生产队成分登记表（12 页，7016 字）
3. “打倒无政府主义 批臭无政府主义”大会材料（7 页，3859 字）
4. 方元大队深挖阶级敌人花名表（11 页，6625 字）
5. 驻方元大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一份决定（定□□为反革命分子，交贫下中农改造）（17 页，10637 字）
6. 方元大队贫下中农忆苦思甜家史展资料（9 页，7384 字）
7. 于 1961 年随子外逃的“历史反革命”分子方三的资料（4 页，2343 字）
8. 方元大队 1973 年 1 月 21 日为方小三（方三之子）落实党的政策呈报材料（22 页，14366 字）
9. 一富农分子有关土改情况的交代书（6 页，2877 字）
10. 方五的被检举揭发材料（8 页，3729 字）
11. 关于大会批斗方六的全面揭发材料（9 页，4155 字）
12. 一富农分子的交代书（8 页，3617 字）
13. 新堰生产队贫下中农启事（“为了‘准备打仗’扫清道路上的一切绊脚石”）（11 页，5413 字）
14. 对一富农发出的最后通牒（要求交代三件事或交出光洋抵数）（7 页，2631

字)

15. 方元大队贫下中农三查小组对方十问题处理的综合意见 (10 页, 6735 字)
16. 一富农分子的交代 (6 页, 2908 字)
17. 关于方□□同志暂缓参加党的组织生活的调查材料及贫下中农座谈意见 (1967 年 4 月 7 号) (16 页, 11769 字)
18. 一个方家“分子”媳妇的交代书 (8 页, 4313 字)
19. 方家两媳妇“靠剥削为生”的交代书 (8 页, 3026 字)
20. 对 1967 年搞造反派组织的方二小的检举揭发批判材料 (5 页, 3106 字)
21. 1968 年方小二对开荒问题的坦白书 (3 页, 1871 字)
22. 孤儿方大华、方小华兄弟俩 1970 年冬季“应征公民政治审查”(对已故家庭成员历史背景调查)的五份证明材料 (8 页, 4098 字)
23. 方元大队党支部、革委会“1971 年发用”的学习、生产决议记录 (16 页, 5371 字)
24. 1970 年方元大队几个社员因挖树茆被责令写出并油印 100 份的处罚检讨书 (8 页, 5377 字)
25. 由贫下中农管理的方元大队农村手工业报告 (15 页, 11667 字)

附录 3——

其它文革资料部分篇目

任冬林整理

1. 湖南一中专学校红卫兵的日记 (4 页, 2931 字)
2. 岳阳地区 1968——1970 年人事调动原始存根材料 (23 页, 10772 字)
3. 1975——1979 年经省、市、县主要负责人批复过的一群众十封来信 (11 页, 8630 字)
4. 1965 年、1977 年进厂的两位亦工亦农人员一次性处理的工伤事故材料 (12 页, 5982 字)
5. 武汉七·二〇事件前武汉部队支左指挥部关于立即制止武斗的紧急呼吁、通令、通知等材料 (16 页, 6620 字)

6. “打倒刘邓陶资产阶级司令部”漫画（46 页，5180 字）
 7. 岳阳地区批林批孔运动的原始漫画资料（16 页，1214 字）
 8. 1971 年 1 月 6 日“在改造世界观上狠下功夫”的演讲稿（6 页，5772 字）
 9. 文革初期一位“出身好”干部的交代（17 年回顾）（3 页，2394 字）
 10. 父亲的申诉（页 50 页，29741 字）
 11. “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对一职工一般历史问题的外调材料（32 页，21230 字）
 12. 一造反派人员在历时一年零两个月“学习班”里的综合材料（55 页，31230 字）
 13. 一摘帽右派文革中的三份认罪书（59 页，33235 字）
 14. 岳阳一单位 1975 年 10 月 25 日援越大米发生“反革命破坏”事故的侦破报告（4 页，2343 字）
 15. 文革手抄本小说《夏天的最后一朵玫瑰花》（5 页，2708 字）
 16. 1976 年手工自制伟人逝世纪念画册（11 页，563 字）
-

【史林一叶】

一个居委会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史料

任冬林

从 1968 年底开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成了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成了各级革命委员会的一项重要任务，而拒绝或阻挠知青上山下乡则成了当时一个要受到狠狠批判和沉重打击的重大罪名。为了逃避上山下乡而力争留城、招工，一些人各显神通，或软拖硬抗，或千方百计钻政策空子、“走后门”。在我所收藏的这一套燎原（吕仙亭）居委会知青上山下乡动员史料中，对这些情况都有生动具体的反映，从那些年久发黄的纸片中，可以真切地感受到那个时代的脉搏。

“大批判开路”的强力动员

当时动员上山下乡的声势和深入程度，从这一份《燎原居委会七三年度上半年工作总结》中可以略知一二：

我们还配合了党的中心工作，做好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工作。今年上山下乡的运动开始以来，我们大会与小会相结合，干部与群众相结合，居委会与单位相结合，广泛地进行宣传教育动员工作。我们从路线教育入手，以大批判开路，以毛主席的教导为指针，在一个月左右共开群众会5次，小组会7次，座谈会16次，其中群众批判会1次，宣传发动、思想教育9次。同时我们还以各种不同形势，经常对青年进行阶级教育，前途教育，分别多次登门，个别反复动员，在工作中我们着重抓了正反两方面的典型。一组共青团员□□□积极报名申请，表示坚决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到农村干一辈子革命；四组违法青年□□□，事先说有病不下，后来通过十来次上门动员教育，最后表示愿意下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通过学习批判，提高认识，我会除1个学生治病外，其余全部愉快地下去了。

总之，我会对于上级交给的各项任务，从来不打折扣，而是如质如量地完成。在批判青年“上山下乡是变相的劳改”的反动谬论时，五组组长□□□嫉耻以自己的子孙为例，深揭狠批。她老人家说：“我的儿子和孙子走毛主席指引的康庄大道，就是走得对，他们和贫下中农一起劳动生活，增长了才干，增强了劳动人民的朴素感情，加入了自己的组织，这一切何尝不光荣。”从此，群众的眼睛更亮了，青年们的决心更坚定了，他们说：“林贼反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是妄图把我们青年一代培养成为地主、资产阶级的接班人，和精神贵族，这是白日做梦，我们走上山下乡的道路就是走对了。”就是这样，我会应下的十四人除一人治病外，其他都积极报名，愉快地到农村插队落户了。

在强大的动员形势下，千家万户都被充分“发动”起来，相互监督，相互撕咬。1969年11月5日，燎原居委会一居民检举居委会一小组长“破坏四向运动，违背党的政策”（所谓“四向”即当时宣传的“四个面向”：面向农村，面向工矿，面向基层，面向边疆。各地对“四个面向”的解释略有不同，但在执行中实际上强调的只是面向农村）：

去冬党号召知识青年下农村，□□□两个儿子，都是下农村的对象而藏留在家，一个也不去，百般的抵赖，把大儿子留在家里学裁缝，二儿子留在城市搞临时工作。后下乡青年走了，运动缓下来了，就把大儿子送到□□茶场搞三个月工作，这次回家马上又介绍到湘粉厂工作，躲避动员。现在说这个没去，那个是对象，落实人家应去的青年，都去了，这种人只口头上革命，行动到自己头上来，则又是一样，民众反映是很大的。

居民小组长都被如此检举，那些“出身不好”的居民就更无计可施了。一家有兄弟俩，因“家庭成分”是地主并且父亲有政治历史问题，弟弟患有风湿性关节炎，想被照顾留城，此想法一经流露，其父即被群众“专政”，并不得不于1968年11月8日写下了一份请罪交代书，其中写道：

（1968年）11月6号晚，医院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再一次把我揪出，群众专政，关着反省，我是抱无所谓的态度，没有认真交代自己的罪行，错误地认为有些问题，已经作了政治结论，抱着侥幸过关的思想，交代也就只交代了一些老问题。

今天晚上，工代会于□□同志宣布说我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说我去串联，我这里提出不是为了我辩护，而是请求组织调查了解，实事求是，如果我真的去破坏了，我愿受严重处分。

我应负没有教育好的责任，至于他们现在还没有下去，我一直还在做耐心的思想工作，等待觉悟，使他们高高兴兴地，真正解决思想问题，去到农村安家落户。我再一次向组织上表态，我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工作从内心检查是没有抵触的，也没有说要自己的子女（不）去下农村，并要他们去串联活动，破坏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这一伟大号召。我要求组织上再深入一点地调查，如果是我破坏了，有串联活动，请求组织上加倍处分。

按照“大批判开路”的做法，这位父亲被群众揪出实行“专政”，“关着反省”，不久被送往五七干校专政队，戴上“阶级异己分子”的帽子，在群众的一片怒斥声中，勒令交代问题。他不得不于1969年1月21日写了长达41页的请罪交代

书，再一次就“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指控做出交代：

自己子女对抗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是犯了罪的。

当县革委会主任毛□□同志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动员报告后，医院革委会又做了些具体组织动员工作，我对自己的子女，就冒（注：“冒”，湖南方言，即“没有”之意）认真积极地做好思想动员工作，只认为他们思想暂时不通，认识是有过程的，就没有注意小孩的思想抵触情绪很大，以至于第二个小孩□□还歪曲毛□□同志的报告，说三查对象的子女暂不下去，他还串联别的同学去的滔天罪行。大小孩□□那晌也冒在家，躲躲闪闪。为什么别人的子女一批二批下去了，我的子女就是冒动，这是对待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伟大号召抱什么态度呢？特别是十一月一日晚，医院革委会古主任再次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指出有一小撮阶级敌人在搞破坏活动和十一月六日晚，医院无产阶级革命派把我揪出来，说我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罪该万死，我当时思想上是不认罪的，认为我没有破坏活动，只是冒做好动员工作，相反的思想有抵触情绪，认为我做了动员工作，小孩不去，这是小孩的问题，这实际上是推脱罪责。

小孩不积极响应上山下乡的号召，就是犯罪，我冒积极做好动员工作，也是犯罪，就是破坏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对抗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是罪该万死！

联想到我过去对子女是冒加强教育的，特别是政治教育和热爱劳动的教育，让他们养成好逸恶劳、贪图享受、不劳而活（获）的资产阶级思想，这就是犯了极大的罪。

为避免给父亲带来更大伤害，这家兄弟俩只好慌不择路地来到当地一水田多的农业生产大队插队落户。患有风湿性关节炎的弟弟落户的生产小队由于田多人少，交通方便，当年年底就接收了知青 45。而他却是作为最早下放到该生产队的三位知青中的一个（三位知青均“家庭出身不好”，其兄被安排到另一个生产队）。患有风湿性关节炎的弟弟如今不得不过早地拄上拐杖来苦度残生。

逐人逐户研究“定向”

当年知青上山下乡，涉及到亿万家庭，在文革“全面专政”的形势下，可以说很难有谁会逃过这种“动员”。从1975年5月19日燎原居委会召开研究“定向”（实为确定某知青是否必须下乡这唯一的一个“方向”）会议的记录，即可见这一工作之细致深入。参加会议的除该居民革委会辖区内各单位负责知青下放人员、各居民小组组长、居委会主任外，还有上级检查组、各工作组组长、城南办事处负责人列席。

在这份《1975年5月19日研究定向会议纪要》中有如下记载（人物名字全部隐去）：

余× 男 17岁 58.3出生，经研究同意上山下乡。

张× 男 57.6.8（出生），（家住）地区贮木场。据本人反映是59年9月（59年9月出生，则未到下放年龄）。徐同志意见：应该以户口为主。经研究同意上山下乡，交单位做工作。

关× 男 57.10，父亲在镇医院工作。经研究同意上山下乡。

赵× 男 58.5月出生。父亲，赵某某在城陵矶搬运社（工作），母亲，先锋路商店营业员。经研究同意上山下乡。

蒋× 女 56.10。原定下放对象。现应下，在办手续。

周× 父亲周某某，现在办手续。

舒× 女 56.6。父亲舒某某，镇卫生纸厂。原已定下放，现属复议，眼近视，归办事处研究。

尹× 女 57.4。父亲尹某某，饮食服务公司。单位做工作多次不通，后提出身体有病。经研究同意上山下乡。

杜× 男 独子女。留城，已发证。

张× 男 母亲冯某某。独子，已发证，要收回证，改为身边无人。

（附：关于张×有关问题证明，证明中称：“张×有一个同母异父的姐姐……从小至现在没有到张家（即继父家）抚养生活过。只有结了婚来到张家住过两次。因此以上情况张×系独，××（同母异父的姐姐）并不是其张家一子女。”）

胡× 女 独女。父亲胡某某，已发留城证。要进一步调查以后再作研究。”

(附：关于胡×的情况，证明中称：“胡×和她父亲自 71 年搬来我组居住以后，我们从未见过她的同母异父的哥哥姐姐到这里来共同居住生活过。所以于 73 年 6 月份发给胡×系独生子女的留城证，特此证明。”))

刘× 男 58.5，高中毕业。作特殊情况的，父母亲在农村，祖父母带大，祖父 73 年死了，祖母身边无人，要到儿子所在地取证明。研究意见：刘×作特殊情况留城、二孙刘某某要现在放到农村去。

刘× 女 57.12 月生，高中肄业，无父亲，母亲张某某，城南电杆厂，身体有病，20 来元钱一个月。一个姐姐下在农村，一个姐姐在饮食店已结婚，月工资 33.50 元，下面二个弟弟。研究意见：作特殊情况定，交大组办事处研究。

刘× 女 56.4，身边无人，一个哥哥在湖南省溆浦县尼（龙）纺（织）厂工作。

熊× 女 一个弟弟现在已下放农村，研究意见：身边无人。

胡× 女 一个哥哥原下在广兴洲，73 年已考湖南省读大学。能作身边一人留，但暂不发留城证。

张× 女 57.12。三个哥哥姐姐现在都下在农村，没有上来。研究意见：同意身边留一人。

汪× 男 57.8。母亲邓某某，小港米厂工作，父亲已死，姐姐在汨纺厂工作。研究意见：身边留一人。

孙× 女 家中六口人，父亲工作，母亲有病，哥哥是个残废，姐姐下放在农村。本人从小头部开刀三次，交医院外科检查后再定，如情况相符就定病残留城。

赵× 男 54 年生，湖北荆州中转站，父亲赵某某。发猪婆疯（即癫痫病），从六岁发病起。研究意见：要补一张病情证明。

刘× 女 55.5。小儿麻痹症，一只脚跛。研究意见：病残留城。

彭× 男 55.6。眼睛近视。研究意见：交大组（办事处研究）。

于× 男 本身父亲 10 年前死亡，4 个小孩，就跟外祖父生活，母亲就改嫁了。男方是个右派遣送农村了，与刘×相比（刘× 女 57.12 月生，高中肄业，无父亲，母亲张××，城南电杆厂，身体有病，20 来元钱一个月。一个姐姐下在农村，一个姐姐在饮食店已结婚，月工资 33.50 元，下面二个弟弟。研究

意见：作特殊情况定，交大组办事处研究），提供大组作特殊情况定。

李× 女 57.4。二中初中毕业，父亲因公死亡，哥哥参加工作，姐姐参加工作。经研究：定为因病缓下（较为严重支气管炎）。

贺× 男 55年9月出生。72年学校毕业准备下农村，粮、户销了4个月。一直至现在，交大组讨论，肝肿大。

文× 男 交大组讨论，肝炎肿大。

鲁× 女 56.10。父亲鲁××，县人民纸厂工作，胃出血病，定缓下。

留城与招工

知青如果因病留城，必须经过严格的体检、审批手续。在一份一九七二届城镇中学毕业生分配登记表的左上端批有：“要体检证明”，右上端批有：“交大组讨论定”。在“机关厂矿居委会意见”栏里记载：“该青年肝肿，72年下放，杨副部长不同意，说有病。现经群众讨论，我会同意，该青年留城。1975年2月22日”。该县城关镇城南革命委员会1975年2月24日在“办事处意见”栏批示：“检查肝病确定”。镇、区革委会意见：“经居委会和检查组研究：定为因病暂缓，交大组讨论。”“县委知青办”1975年5月29日批示意见：“经检查组研究决定因病暂缓”。

这套史料中有一份燎原居委会1975年造的该居委会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花名册。花名册分别列了：应下、病残留城、年缓（因年龄未到而缓下）、多子女身边无人、特留、病留、独子女七个方面。

一位15岁七三届女初中毕业生因“年龄未到”，“暂缓动员”下乡的“跟踪表”上，三个部门分别批示：“年龄未到，同意不下”；“同意不下放”；“暂缓动员”。

该女生的《一九七三年四个面向分配登记表》（制表时间为1973年3月23日）上，右顶端批有这样的文字：“74年已下放。”看来这位女生“暂缓动员”的时间并不长，年龄一到就还是下放去农村了。

像这样的知青上山下乡通知书，是当时许多家庭都会收到的：

最高指示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兹有 □□□ 同志全家 □ 人坚决执行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决心参加农村三大革命运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经研究批准到 □□ 公社 □□ 大队 □□ 生产队安家落户。

“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共同敬祝

毛主席万寿无疆！

岳阳县革命委员会四个面向办公室

1969 年□月□日



（左图：一个生产大队的知青下放手续表。）

当时知青及其家庭最希望得到的则是《知识青年不动员通知单》，燎原居委会这套史料中即有这样几份：

燎原居委会：

你处□□□同志：因特殊情况（父母和两个弟弟在农村，祖父已死，祖母年老（60岁），一个弟弟（9岁在城读书，系农村粮）经群众评议，领导批准，不动员上山下乡。特此通知

中共岳阳县委知青办 一九七五年六月十三日

燎原居委会：

你处□□□同志：因身边无人（该同志两姐弟，姐在汨纺工作），经群众评议，领导批准，不动员上山下乡。特此通知

中共岳阳县委知青办 一九七五年六月十三日

燎原居委会：

你处□□□同志：因右眼 0.1，左眼 0.08，可戴 600 度眼镜，属病残。经群众评议，领导批准，不动员上山下乡。特此通知

中共岳阳县委知青办 一九七五年六月十九日

当时为了防止应该下乡的知青留城工作，还对招工（不仅是正式工，还包括临时工、合同工）做出了许多规定，并从已经招收的青工（合同工）中进行了清退。一位 1944 年出生，已到应该养家糊口年龄的知青，在 1969 年 6 月 2 日的自传中写道：“67 年 4 月份，并承我会（注：指居委会）推荐，介绍到某某港务局作合同工至 1969 年元月份，因下放政策的落实，青工（合同工）全部不合理的辞退，故只得返会。”

这类证明还有另外一些不同内容，如：

证 明

□□□同志，在我厂任临时合同工。因合同期已满。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国家单位不能长期雇用临时合同工工种，给予辞退，特此证明。此致

岳阳县拖拉机修配厂革命委员会

一九七一年九月廿五日

已给生活补助费 200 元，请居委会接洽。

岳阳县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组 计划组

（劳动工资专用章）

1971 年 10 月 7 日

一位 35 岁妇女随军人丈夫复员调走，也须经当地“四个面向”办公室签发的介绍信：

镇工业组负责同志：

兹有我社社员□□□同志，女性，现年卅五岁，是 52 年在湘潭市参加工作，64 年转来我社，技术级别四级，特此证明。请给予转证明一纸。（因爱人军人，

复员随同)

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单位略)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三日

此证明的右顶端上批注：“该员系我镇缝纫社正式集体职工，经研究同意转湘潭市爱国缝纫社工作”，由该镇“四个面向办公室”盖章（69.4.13）。

不过，“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再严酷的运动也会有人钻政策的空子，千方百计找关系，“走后门”。在这套史料中就有一位省城来的 16 岁男学生，不知其家长凭借什么关系，施展了什么手段，于 1969 年以“湖南省劳动工资管理局职工调动（安排）工作介绍信”，“户口粮食关系自带”，轻而易举异地当上了“学徒工”。当地安置介绍信（1969 年 12 月 17 日）存根显示：这位 16 岁的男生被安排到该地区生资站工作，“熟练期为 6 个月”，原工作单位栏内填写“省局介绍来”，“学徒工”1 级，工资 28 元，限 12 月 18 日报到。

另一份写于 1972 年 11 月 21 日的“□□□家庭呈”的《□□□家庭历史及个人简历情况》，则记载了当时最为幸运的极少数知青的去向：“□□□1965 年毕业于青年路小学并同年考入××五中（广兴洲）读初中。在学校于 1966 年上期加入团组织，在学校评过二次五好学（生）和多次表扬。在 1968 年上半年应届毕业生，因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运动中复课闹革命回到了学校，在三月份回家从吕仙亭居委会应征入伍参军。”

这一材料还分别写了该生的祖父、祖母、大伯、二伯、姑妈、姑爷、外祖父、外祖母、舅舅、姨妈、父亲、母亲及兄弟姊妹的简历，不知是否为在部队上入党或提干而“查三代”的需要所写。

已经下乡知青的“倒流城市”问题

当时已经下乡的知青“倒流城市”现象较为普遍，已引起了一定的社会问题。

一位 1968 年下乡，1970 年倒流回到城里并结婚生子的女知青居民（这时的她已具备知青、城市居民的双重身份）情况摸底表，该女知青到填表时的 1976 年 8 月 4 日，“已生儿一，育女二……”

该女知青在该表“本人简历”栏内写道：1968年下放在荆州公社，1970年倒流回城至今。从7岁到17岁在校读书，18岁下放，21岁回城。回城后一直在家做临时（工）和做缝纫。她在“备考”栏内填道：“本人是知青下放与铁路工结婚，无粮无户。返城做缝纫，要求组织解决。”

在当时的经济体制下，个人做缝纫只能略微增加一点经济收入（还会时时面临被当作“资本主义自发倾向”打击、处罚的危险），而“无粮无户”，则会失去很多生活必需的条件（得不到政府按户发放的粮票、油票、布票及其他各类日常生活必需品的供应票证），有时不得不花高价到黑市去购买生活必需品。

因一些“倒流城市”的知青基本生活无保障，前途暗淡，便派生出许多社会治安问题，使回城知青成了社会治安工作的“重点控制对象”。在1975年2月3日《燎原居民革命委员会1975年春节期间安全保卫工作规划书》的第四项“重点控制对象”栏内，就将“三个都是下放的知青”列为重点控制对象，并落实有专人“监督、控制他们的行动”。这个规划书还称：“在处理问题时，认真执行党的政策，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如发现重大案件，及时向上级报告，随时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倒流回城知青已经被当成“阶级敌人”了。

鼓噪一时的“株洲经验”：厂社挂钩安置知青

鉴于当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存在的普遍问题，湖南省实行厂、社直接挂勾安置知青的“株洲经验”应运而生。

“株洲经验”作为安置知青的先进模式被迅速推广至全国。该经验是“学习、劳动在场，户口、分配到队”，工厂也派出一定人员协助贫下中农参加对知青“再教育”的管理工作，并从物资上给予一定的支援。当时这一措施虽然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也减轻了国家的压力，但增加了企业的负担。在这套史料中有一份写于1977年的《知青点建设的好范例——长沙县艳群大队药场知青点的调查》（摘要）：

省委知青办按：长沙县乌山公社艳群大队与省医药器材公司挂钩，认真学习推广株洲经验，在大队药场集体安置知识青年。由于大队党支部和公司党委

双方路线对头，思想明确，高度重视，加强领导，知青点建设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创造了比较完整的经验。省委领导同志亲自到这个知青点检查工作，听取汇报，对他们的经验给予了肯定和赞扬。

长沙县乌山公社艳群大队，与省医药器材公司挂构建知青点，一九七五年六月开荒创办药场，实现了一年办场，二年自给有贡献。去年，药场收入六万五千多元，这个大队粮食增产一成，亩产过了纲要，社员人平收入增加十八元。参加分配的四十一名知识青年，从生产队分粮一万七千九百多斤，分钱（包括口粮款）二千六百八十四元。下乡一年以上时间的知识青年和在场劳动的社员，药场每月每人补助伙食费六元，知识青年另发零用钱三元。人平口粮七百斤，人平收入（包括补助部分）二百零六元，除吃饭外，人平现金收入六十六元。知青点食堂自己种菜养猪，蔬菜自给，每月杀一头猪，每人每月吃油一斤半。

这得益于大队党支部的领导和带队干部的配合下，知青点加强了对知识青年的培养教育工作。

一是抓学习。规定每周二、五晚上集体学习，一、三、六晚上自学一小时，知识青年认真看书学习，人人有学习计划，个个写心得笔记。毛泽东选集四卷，有的读完了第一、二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后，知识青年争相阅读。

二是抓阶级斗争。组织知识青年投入批判“四人帮”的伟大政治斗争，学习毛主席、华主席关于批判“四人帮”的重要指示和中央文件，联系实际，深揭狠批，召开批判会，写批判文章，办学习与批判专栏。

三是抓经常性的思想政治工作。进行忆苦思甜和革命传统教育，开展学习雷锋同志的运动，坚持一周一次团的活动，一月一次民主生活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表扬先进，做好后进青年的思想转化工作，开展多种有益青年身心健康和业余文体活动，知识青年自己编写，出版油印刊物。一月一期，分送社队、公司和家长。

四是农忙组织知识青年回队劳动，经常下队辅导社员学习，参加生产队的活动，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五是抓培养骨干。发展团员十名，培养了建党对象，选拔知识青年担任区、社、队团委领导工作，场组骨干和赤脚医生、拖拉机手、农村电工等项工作。

经过农村三大革命运动的锻炼,知识青年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不断提高,成长进步很快,决心做又红又专的新型劳动者。

省委知青办调查组

余震：在揭批“四人帮”中继续狠抓知青下乡运动

从前一史料可知,直到“四人帮”倒台,文革破产的1977年,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仍然在按部就班地进行。在燎原居委会史料中有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主任毛致用1977年4月27日在地、市知青办主任分片碰头会上的指示,其中说道:

“我省每年有七、八万人要下乡。长沙是省会城市。这几年长沙做了大量工作,成绩是主要的,长沙县还可以安排一些。今年可能多数还安置在长沙县,但全部安排在长沙也是一个问题,其他地(县)要作好工作,接受一部分知青,安乡县已打报告要求长沙去知青,这很好……”

“长沙靖港区对知青是抱积极欢迎态度的。有些不那么欢迎的,要好好组织这些干部学习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指示,要欢迎他们去。”

“有些单位思想明确,厂社挂钩帮助发展社队企业,这很好。对缩小三大差别、支农有好处,证明株洲经验很好。今年要继续推广株洲经验,按株洲经验办,集体安置。”

“接受安置知识青年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不要有东西支援就欢迎,没有东西就不欢迎,这种思想要严肃批评,严重的要处分。应该是有支援的要接收,没有支援也要接收。不能光表扬那些支援东西多的单位,就说他们是认识好。社队不能把支援东西作为接受知识青年的条件。”

还有一份《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中一些具体问题的规定》,显然是总结了多年来知青工作的经验而做出的非常具体的规定:

一. 独生子女不动员上山下乡。

独生子女是指一子一女，有两个子女，包括同父异母、同母异父、异父异母的子女，均不能视作独生子女。带养或过继的子女，必须是从小抚养，办有手续，群众公认。

二. 多子女身边只有一个子女的，不动员上山下乡。

一般是先满十七周岁，先动员下乡。少数情况特殊：如父母双亡，弟妹年幼，或父母一方死亡，一方患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弟妹年幼无人照料；父母双方严重病残，生活不能自理；弟妹年幼，家庭经济特别困难，长期靠救济和补助生活。经群众评议，领导批准，可留大下小。

多子女只能留一个子女在身边，但如有子女系盲、哑、呆、瘫、生活不能自理，经群众评议，领导批准，可再留一个。

凡子女与父母居住在××市、县范围内，吃国家商品粮，不论婚嫁，均按父母身边有子女对待。

从父母身边升学（包括大专、中专、技工学校）的，在学习期间，暂按父母身边有子女对待；凡参军和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升学的，均不按父母身边有子女对待。

父母分居两地，只能在一方留一子女在身边。

夫妻离婚后子女的归属，应以法院判决为准。

三. 因病残不能参加农业劳动的不动员上山下乡。

病残是指断手断脚、鸡胸龟背、眼睛失明等明显残废和患有精神病、癫痫病等，这些人经过评议，领导批准，不动员上山下乡。

凡患有在长时期内难以治愈的严重慢性疾病和严重器质性病患，不能参加农业劳动的，经群众评议的，指定的医院体检组检查，领导批准，不动员上山下乡。

对因病残不动员下乡和因病残批准返迁回城的知识青年，主要组织他们进“五七”工厂和街道厂、组，国营单位一律不予招用。因病残批准返迁回城的知识青年，经过治疗符合招工条件的，集体所有制单位，可以招用一部分。因病残不动员下乡的知青，两年内也不准招用。

对确系因公负伤返迁回城或留城的知识青年，集体所有制单位招工，可视其情况，适当安排。

四. 凡确定为上山下乡对象而未走的，以及倒流城市的下乡知识青年，应坚

决动员他们上山下乡或返回农村。任何部门，任何单位不能给他们安排任何工作（包括临时工、合同工、承包工、基建民工、家属工、临时包工或厂外加工等）。各单位要认真清理。已经安排了的，必须坚决辞退，并负责动员他们下乡。今后，劳动工资部门，用人单位安排和接受劳动力时，都要先检验县市以上知青工作部门有较不动员证明。

五. 独生子女、多子女确定留下的一个子女，留大下小照顾家庭特殊困难的子女，有关部门根据国家规定有计划地安排他们的工作时，尽量安排在父母居住的市、县范围内。

六. 已定为下乡对象而因病暂缓下乡的，应积极治病，治病期间，任何单位不得安排他们任何固定或临时工作，病愈后应积极动员上山下乡。

七. 随同父母调动迁移的干部、职工子女（迁出前未定向的）以及其他社会青年，年满十六周岁后，均应进行定向分配，未定向的，一律不得安排他们的任何工作。

八. 年龄未满十六周岁的，又未经过有关组织批准，自动停学的在籍学生，一年内不列入定向分配。

对应届毕业生和年满十六周岁以上的未分配定向的青年，未经家长所在单位的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公安、粮食部门不得单独转迁这些人的户口、粮食关系。

九. 有动员任务的国家机关、厂矿企事业单位和大、中学校，要选派政治思想好、作风好、身体较好、政策观念强的干部担任知青点的带队干部，带队干部按下乡知识青年的百分之三的比例选派。有接受安置下乡知识青年任务的场、队要参照带队干部的条件，选派贫下中农去带领知识青年，共同担负再教育的任务。带队干部和带队的贫下中农要和知识青年同学习、同批判、同吃住，满腔热情的教育培养知识青年。

十. 认真做好下乡知识青年的财产，经费管理和使用。国家给下乡知识青年兴建的房屋、购置的农机具、家具，归知识青年长期使用，并由所在的社、队和下乡知青管理，不得转让和变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占用。公社要建立房屋和财产登记，大队和知青点建立保管制度。

十一. 下乡知青调离社、队，不再返回原地时，剩余的安置经费，由社（场）收回，报市知青办备案，由公社知青专干掌握。知青个人使用的家具、农具等在

离点前，要办理清理交还手续。否则，安置社、队可以不予办理粮食、户口转移手续。

中共岳阳市委知青办 一九七七年四月十九日

不过，形势毕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也随之悄然出现了变化。在燎原居委会这套史料中，就有国务院知青办关于推迟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电话通知。

各省、市、自治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曾于一九七六年二月十二日批示：“知识青年问题，似宜专题研究，先作准备，然后开一次会，给予解决。”为了贯彻执行毛主席这个重要指示，去年曾组织几个小组，分赴各地，进行调查研究。但是，由于受到“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会议未能开成。今年下半年，华主席、党中央、国务院要抓的大事很多，各级党委的工作任务很重，召开研究知识青年问题的会议的准备工作还需要继续进行。经中央批准，全国知识青年工作会议推迟到明年上半年召开。

中央批准的文件中指出：“今年会议不开，但各级党委要进一步加强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领导，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深入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把被‘四人帮’搞乱的思想、路线、方针、政策纠正过来，及时解决知识青年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特此通知。

国务院知青办

一九七七年四月二十一日

如同高速行驶中的列车在刹车后还会继续前行一段路程一样，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并未随着形势的变化而马上停止，燎原居委会这套史料中有岳阳市委负责人1977年8月8日在全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动员大会上的报告，其中总结说：“据不完全统计，自1973年以来，下放知识青年中，有216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有 7575 人加入了共青团，有 1484 人参加了各级领导班子，有 5386 人担任政治辅导员、民办教师、赤脚医生、农业技术员、农机手，成为一批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新型劳动者。”

报告对目前上山下乡工作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批评：“还存在很多薄弱环节。如有的单位领导同志，对知青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重视不够，抓得不紧；少数领导对知青工作很少过问，以致少数单位知青动员和安置抓得迟、进度慢、工作被动；还有少数单位不注意执行党的政策，不坚持党的原则，片面强调照顾干部、职工，任意扩大留城面；有的则乱招乱收应下未下和倒流城市的知识青年和年满未定向分配的青年做临时工、合同工，影响知识青年下放工作；还有的单位对株洲经验理解不全面，推广不坚决，城市动员单位不肯支援，农村依赖支援的现象都存在；也还有少数家长和知识青年对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指示，思想上怀疑动摇，消极抵触，致使一些应下去的知识青年长期逗留城市。”

报告还“与时俱进”地把知青上山下乡与揭批“四人帮”联系起来：号召要“深揭狠批‘四人帮’，要着重批判他们篡改毛主席的指示，鼓吹‘自己消化’，反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罪行……”

报告以文革时期的习惯用语向人们发出警告：“当前，要密切注视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警惕一小撮阶级敌人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革命运动。譬如，最近，就流转一种谣言，说什么‘打倒了四人帮，知青不下乡’，什么‘今年四个面向，成绩好的升大学’等等。这些都是谣言、谣传……如果属于阶级敌人的破坏和捣乱，要坚决打击……另外，要加强劳动管理，对于乱招乱雇的要立即制止，并严肃批评教育，情况严重的要严肃追查处理。我们再次重申：凡属上山下乡对象、倒流城市的知识青年、未定向的青年，任何单位、任何部门，不得安排他们任何工作，否则要以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论处；违反了的单位，其主要负责人要作公开检讨，银行应拒付工资。”

报告要求：“要坚决执行中共中央（73）三十号文件精神。今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动员对象，除中央和省委文件规定不动员的几种人之外，凡是年满十七周岁的应届高、初中毕业学生，不在校的社会知识青年和历届确定下乡未走的，都应在规定时间内坚决全部动员下去。计算年满十七周岁的时间界限，根据地委的规定，指在今年 8 月 31 日以前已经满十七周岁的。但在这个时间内虽说未满十

七足岁的应下对象，只要本人和家长都有要求，也可以下去。”“要认真搞好今年定向评议，严格控制留城面。属特殊情况留大下小的要从严掌握，坚决按市知青办的具体规定执行，不得任意放宽尺度……因病残不动员下乡的知识青年，一般只能进街道厂、走‘五·七’道路；即使国家有计划招收的时候，也只能安排在集体单位。除明显残废和因工负伤致残的以外，都要在留城两年后才能招收。”因特殊情况留大下小的“在一个家里，只能是一次。”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终于成为一去不复返的历史，成为人们将会长期争论、研究的历史。这类散存于民间的史料对研究这段历史弥足珍贵。

【史林一叶】

一个“特嫌”老人的十二份交代

任冬林

在我收藏的燎原（吕仙亭）居民革命委员会的史料中，有一份 1972 年《清队“一打三反”运动中被审查揪斗对象花名册》，该花名册所列的“被审查揪斗对象”，是该居委会居民中 26 位平均年龄在 60 岁以上的老人。其中女性 20 人，男性 6 人。

据 1969 年 7 月 20 日吕仙亭居民治安委员会工作报告称：我会共有四类分子 16 个，全部在（当年）4 月 15 号前遣送农村。那么，在“清队”和“一打三反”中这 26 位“被审查揪斗对象”，应该是 1969 年 4 月 15 号后从非“四类分子”居民中“深挖”出来的。从花名册上可知，她（他）们的被“审查形式”和被“审查揪斗原因”分别是：

1、参加“居民会学习班”14 人，“审查揪斗原因”主要是“成分问题”，另外一人为“叛徒”，一人有“历史问题”，一人为“解放期间组织了反革命集团”，一人“参加伪教会二十多年特嫌”；

2、“南区揪斗”2 人，“审查揪斗原因”一为“写反标”，一为“历史问题”；

3、“群众揪斗、居民会学习班”2人，“审查揪斗原因”均为“历史问题”；

4、“县军管会、派出所审查”1人（一位66岁的女性居民），“审查揪斗原因”是“张贴反标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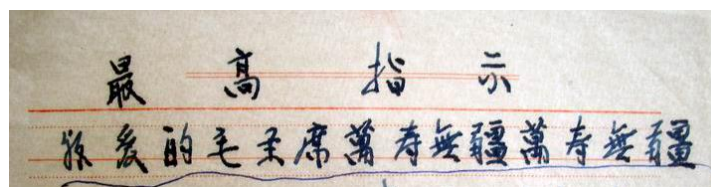
5、另有7人“审查形式”栏内为空白。根据“落实处理情况”栏的说明可知，其中有五人被遣送农村。

在被列入上述花名册，参加“居民会学习班”审查的老人中，有一个钟审安，他的被“审查揪斗原因”是：“参加伪教会二十多年特嫌，内定21种人。”（在1969年12月20日居委会的重点建档人员表中则写的是“福音堂工作20多年另有特务嫌疑”。）所谓“伪教会”，指的是民国时期由美国传教士办的基督教会，“特嫌”即“特务嫌疑”的简称——认定“参加伪教会”就等于有“特嫌”，这就是当年的一种普遍认识；“21种人”是湖南省文革中支左部队领导人黎原（四十七军军长，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中共第九、第十届候补中央委员）强调的在“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中需要重点清查的对象，指的是文革中1967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即“公安六条”）中列出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劳动教养人员和刑满留场（厂）就业人员，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道会门的中小道首和职业办道人员，敌伪的军（连长以上）、政（保长以上）、警（警长以上）、宪（宪兵）、特（特务）分子，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但改造得不好的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和被杀、被关、被管制、外逃的反革命分子的坚持反动立场的家属……”等一系列人员。

在这套史料中，有钟审安老人从1969年5月14号至1971年元月21号写下的十二份交代材料。研读这些材料，可以大致了解到这位老人在文革中所受到的精神上 and 身体上的迫害。

钟审安老人文化不高，所写材料文字有不少欠通顺的地方和错别字（他自己在交代中说“我每次写的字【自】传，都是白字多，有许多干部看不通”），有的交代还写得有些颠三倒四，在讲民国时期的事情时忽然又扯到文革前后了，甚至还在按当时惯例开头写“最高指示”的地方错写了“敬爱的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但是，正是这些保留着“原生态”的真实史料，才显示出了它们的独特价值。

从材料中可知，钟审安民国时期曾在基督教会担任杂役，从事做饭、洗衣、挑



运东西、敲钟、扫地、看门、宣传卫生等工作，本是地道的劳动人民，应算作“当家作主”的革命的“动力”，但是仅仅因为与教会的这层雇佣关系，竟使他得到一个“参加伪教会二十多年特嫌”的罪名，成了革命的“对象”。

在“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吕仙亭小组、吕仙亭居民委员会”1969年10月3日所写的一份《钟审安问题综合材料》中有如下记载：

钟审安1918年（21岁）来此地谋生，“先在梅西桥、湖滨两地做了不到两个月的零工，后由□□□介绍参加湖滨中学杂务工作不到四年，1921年又由熟人介绍参加伪□□县邮政局当邮差三年之久。1924年由老师□□□（云溪人）介绍参加大美福初会，即中华基督教会福音堂工作，经常为□□、□□、□□、□□等四县共十个分教会送钱、送信（1925年参加教会为教徒）。”1938年因抗日战争爆发，钟审安回老家不久，即与王□□等四人在家乡筹建了“中华基督教会乡村布道团”，钟“为正式团员之一，并分工担任讲卫生课。”

1946年下半年，经城内牧师传信，“钟又返□恢复了职务。同时，在梅溪桥福音堂一直坚持教会礼拜活动。到1967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期，才被广大革命群众责令迁出教堂，居住现在的居民宿舍。”“钟审安由于在美国洋人教会中生活二十多年，以致迷信极深，因而连两个儿子的名字也按美国佬的圣经而取（长子叫约翰，二子叫雅可）。钟为美国佬做事也很贴心、可靠，当洋人利用汇票兑换银元手段，大肆侵夺我国金银之际，钟在□□城里的正大、申昌、严万顺、严万兴等四户大资本家兑换挑回的光洋整1800元。”“美国佬给钟的经济待遇，除了每月发给固定12—16元光洋，能维持全家大小生活外，还在1950年4月我政府将美国头子惠施霖驱逐出境时，竟将钟审安1人带到湖南大会，赠送光洋100元，衣物一袋。……”

仅从这些批判性的文字中也可以看出，钟审安是一个十分诚实、纯朴、勤劳，具有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劳动者，所谓“为美国佬做事也很贴心、可靠”，其实不过是他做事认真勤勉而已，他自己每月所得薪酬为12—16元光洋，却任劳任怨

怨地替教会“兑换挑回的光洋整 1800 元”（相当于他月薪的百倍以上），充分说明教会对这位诚实的杂役的了解和信任。

然而，钟审安却不得不为那段“特嫌”历史进学习班接受批判，并被迫写下一篇篇交代。老人为了求得当局的宽恕，尽量采用了一些时代语言、流行套话，以表现自己顺从甚至感激的态度，读着这些文字，不能不让人感到既荒诞又心酸。下面这篇 1969 年 5 月 14 号他在区革委学习班里写的交代就很有代表性：

此人钟审安住吕仙亭居委会八十二号。

69 年.4.18 号，得了通知，在南区革委会召开。

上午在南区听了李部长的报告，这会【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将尽【近】有廿五天。感谢党、毛主席，此人在中华基督教会做工多年，没有受过教育。这会【回】党安排廿五天了，万主任天天报告，各未【位】同学帮助我，原因，我们就【旧】时代人，在黑暗时代过了五十多年，被地主压制我们，不能翻身。到 50 年，毛主席来了，穷人翻了身，当家作了主，工人翻了身，感谢党、毛主席，有出路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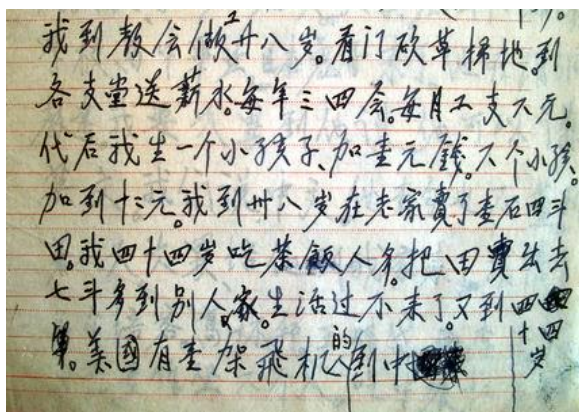
我一家人，大小八个，六个小孩子，都有工作了。（我）在教会做工共十七、八（年），日本鬼子来了，（我）回东乡渭洞，种田八年，

光复后，回岳阳。美国人在中国架教会、传（教），办学校、医院，□□中国人来。依原在教会做工三年。到 49 年。

解放了，全国人民都翻了身，我一家小孩子都是党培养他们，有了出路，这才是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子子孙孙有饭吃，不忘恩，谢谢党何【和】毛主席。完了散了会，回家来好好安家生产，不乱说，不乱动，听毛主席话，听党的话。

钟审安并未替自己的所谓“特嫌”进行辩解，大概他也认为他过去服务的对象是“敌人”，知道辩解是徒劳的。他只是如实地对自己在教会的工作情况作了一些交代，在写于 1970 年 1 月 18 日的交代中有这样一些内容：

我到教会做工廿八岁，看门、砍草、扫地、到各支堂送薪水，每年三、四会【回】。每月工资六元，代【待】后我生一个小孩子、加一元钱，六个小孩加到



十二元。我到卅八岁在老家卖【买】了壹石四斗田。我四十四岁吃茶饭人多，把田卖出去七斗多到别人家里，生活过不来了。

在写于1969年9月22日的一份交代中，钟审安写到了他的简历和在教会工作的一些情况：他四岁亡母，八岁读书三年，十二岁父亲得“边分病”（中风半边瘫痪）卧床三年去世。父亲卧床期间，将家中仅有的二斗五升田卖掉。从此，“兄弟三人种地主田七斗多，有四、五年，搞不来，年年无饭吃。到廿岁，我想出外找工做，把小弟完婚之后，廿一岁上街。”先打零工，后到一学校洗衣服三年，二十五岁时到一邮局送了三年信。二十八岁时，“塔前街福音堂请人看门、砍草、扫地，□□□老师介绍我去的，每月工钱六元。到廿九岁，在堂内接（注：即“娶”）妻子，不到两年，生了大女儿，得一个小孩加一元钱，做了十多年。到四十二岁，日本鬼子来了，我带起小孩子回到渭洞老家。”这之前，钟审安在老家置了一担四斗田。“我同大舅□□□，把自己田种好，也是吃不到油盐……不到一年卖出田七斗多。”这时钟审安家有人口八人，另还要养胡家外婆四人。四十四岁时，在王□□筹建的中华基督教会乡村布道团里“做饭、洗衣、出外挑担、答清卫工（讲卫生课）约有一年另五个月，”光复后，“我上了街，依原（仍旧）在教会看门、打钟、扫礼堂三年多。”

解放了，“我在岳师（校）找工做两年……我又到人民医院做两三年。”“现在我家男女六个，大女儿在汉口卫生院，女婿他有七个人吃饭，外有母亲。前上十年把钱送妹妹读书，现在没有了，他人多，小孩子读书。”1955年，钟审安的两个儿子，“约翰考取汉阳工厂，雅可考取北京钢厂。再者都是领取助学金甲等。感谢毛主席和党，子子孙孙不忘恩，要尽忠报国，尽心尽意，为人民服务，现在他二人都在外搞调（查）。文化革命到现在，也未站错队，政府信用他们，也没受过病，身体好。大儿子三个人吃，在西安国营机械厂，今年未来钱，媳妇身体不好，有病、没有工作，他常常出差。第二个儿子在马鞍山市钢铁公司工作，现在未结婚，搞外调故亏身账，没有好多钱寄来。生活暂时的困难，现在我带了两个小孩子搞柴火烧，请朱同志原谅。52年土解【改】成分小土地出租，共有六

斗八升田。”

在同样写于 1969 年 9 月 22 日的另一份交代（这一天他写了两份交代）中，钟审安写到了有关他从抗战中到 1951 年美国传教士被驱逐时在教会工作的一些情况：

王特岱在篁口福音堂。被【避】难迁到渭洞。张谷英大屋住。他写信到沅陵福音堂，要【我】到渭洞。失【是】个布道团。有四个人高怀邦，李丰，王特岱。他三个人都有文化。要我帮他们热饭、洗衣、出外挑担、答讲卫生。我说无文化不能讲。王教师说，讲卫生不要文化。在张谷英搞了一年零五个月停止了。在乡下讲福音书无人听，工夫做不容，没有人听。

……解放了。到 51 年，美国人（注：指他所在福音堂里的美国传教士）住在武汉，我们政府，要他回国去。他坐火车经过□□，在塔前街堂内住了一晚。惠施霖牧师说：钟审安，你今天同到长沙去，拿东西来。当时，我同到长沙，在湖南大会住了一晚。到第二天，他把一袋旧皮鞋子（和）一百元钱，要我坐车回来，鞋子、一百元钱五个人分，三个大师傅，有两个杂工，每个人廿元钱，三、四双皮鞋子。

……

我到第二天八点多钟坐车，他交钱、鞋子，到【对】我说，你们做礼拜，这个钱送到【给】你们做工钱。

在写于 1969 年 9 月 26 日的交代中，他还写了这样一些内容：

我在堂内住了十七年。解放后，我在鸡窝山种租地两年，乡下土改未种了。又在岳师校（替）瓦匠做副工两三年，瓦匠死了未做。又到人民医院彭金和瓦匠做了两三年。最近五年，就在搞山打柴火，政府节省煤炭，每天回转路程卅里路，每天吃两餐饭也是苦。……我在堂内住房子，每月出租金，种菜有点地，吃菜不到外面买，好处在这里，方便。……我搬到先锋路来（是）67 年八月十八，来靠山打柴火，到九月靠山去（检）栗子……

从钟审安前前后后所写的这些交代中，可以了解到这位老人完全是一个地道的劳动人民，一生都靠自己的诚实劳动挣钱吃饭，含辛茹苦养家活口（只有在为教会做杂役时生活才算稍微稳定一些）。对这样的老人，完全应该得到人们的尊敬和关爱。然而，在那个荒诞的年月里，他竟被当成了人人可以批判斥责，冷眼相对、恶语相向的“揪斗对象”。这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哀，也是我们民族的悲哀。

在钟审安的交代材料中，还有一份颇有意思的是关于抗战中接待美军飞行员吃饭的交代。

今天的人们已经忘却或是根本就不知道，曾经有一段时间，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将承担着抗日战争正面战场艰苦作战任务的中国政府军（国军）称作“伪军”，将政府军的抗日将领称作“伪军官”，将领导抗日的国民党各级政府称作“伪政府”，国民党官员称作“伪官吏”——与日本扶植的汪伪军队、汪伪政权混为一谈，而前来帮助中国人民打击日本侵略军的美国盟军，则被按照反美宣传的需要称之为“美帝国主义”。于是，在抗日战争中营救、帮助美军飞行员就成了必须交代的“罪行”。钟审安在这份写于1970年1月18日的交代中写道：

又到四十四岁，美国有一架飞机的人到中国来，帮中国打日本鬼子。听说飞机到大云山，山高得很，把飞机撞下来了。岳阳县政府迁到渭洞来了，县政府派人，【把美军飞行员】接到渭洞，在冯次翼家中住了十多天。我到【对】冯次翼说了，我想请他到我家来吃餐饭。来不来。冯次翼他父亲是共产党员，次翼在岳阳湖滨学校高中毕业。日本鬼子来了，他在渭洞教书。我要次翼到【对】他说。他可以讲英文，我们说中文，他一句也不懂。到第二天，冯次翼陪【陪】他到我家来了，我请了三个陪【陪】客，高怀邦，王特岱，李丰，我自己，壹作【桌】坐六个人。吃中饭。十二点钟到下午两点钟。次翼带他走了，我没有买东西到【送】他。也可以调查。现在有人证，调查清楚。证明人有冯次翼，有王特岱，李丰，要他们证明，查清更好。到的到我家，住了没有住。

我为什么接他吃饭，他到中国来，也是远客，打日本鬼子。他说话我不懂【懂】，我说话他不懂【懂】，但是我们。在就【旧】时代过日子，不小的【晓得】日立、□立（注：原意不明），孟孟【懵懵】不知天，那【哪】个是敌人，那【哪】个

是朋友，份【分】不出来，要请政府原谅我。现在我们毛主席来了，解放廿周年，每一年学习五会【回】，廿周年也学习一百会【回】，谁是敌人，谁是朋友，一定要份【分】清楚。

我今年感谢党、毛主席，前后学习有两个多月时间。我每次写的字【自】传，都是白字多，有许多干部看不通。我在就【旧】时代过了五十多年，做了许多怀【坏】事情，应该向党交清楚，早早产别【坦白】。毛主席说过，产别【坦白】从宽，抗住从年【抗拒从严】，这是我大错特错，对党和毛主席不忠。

1971年1月21日，钟审安不知是生病还是年老体弱，又请人代笔写了一份《学习心得》，其中写道：

通过几天来的学习，特别是通过七一年《元旦社论》的学习，使我阶级觉悟和路线斗争觉悟有所提高，更使我认清了国内外一派大好形势，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就论断的“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

我在旧社会过了40多年，虽然没有参加过任何反动党团组织和其它集团，但在那时，有时是为敌人服务，帮敌人的忙。在教会的前后19年中，都忠心为帝效劳，当奴隶，如看门、打铃、打扫清洁等等。没有认识到这是帮敌人做事，这完全是立场问题，现在应老老实实向党和毛主席请罪。……

解放前后，直到1967年8月，我一直住在福音堂，我的生活最主要是靠在人民医院、岳阳师范做小工，教会我每星期打扫、抹洗教堂一次，每月工薪5元，除房租2.50元外，还有2.50元钱。从没有与教会上的经济打过交道，掌权者是王□□、余□□，我根本无权掌握。在解放后，55年帮余□□砍竹子，脚刺进三寸长竹尖，共烂两年半，他们没有出分文钱，而余□□的丈夫重病，到处诊治，都是教会上的钱，死后又用教会一千多元，都是教会的钱。

尽管老人为了表现自己“阶级觉悟和路线斗争觉悟有所提高”而竭力歌颂新社会，丑化旧时代，甚至挖空思想出了一点教会的不是来进行“控诉”，但作为“特嫌”，作为“革命对象”而非“革命动力”，他仍然不可能享有向公众进行“忆苦思甜”以表明自己“苦大仇深”的荣幸。

不仅如此，按照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推行的“全面专政”理论，对“反动分子”的专政是没有年龄限制的，即使到了法定退休年龄，“专政对象”也得接受强迫学习和“劳动改造”，不敢有任何怨言。钟审安在请人代笔写学习心得的这一年，已是75岁高龄，他实在不能再忍受这样无休止的强迫学习和“劳动改造”，竟写出了一份要求“退休”的报告。这在那个年代实属罕见的例外：

吕仙亭居委会负责同志：

六九年九月十八号起，挖防空洞到十二月廿号，共计拾伍个半工。

十二月廿号，奉命到五里公社修路，到廿六号，白天五个工，又做晚工两个，半夜一点起到早晨六点钟收工回来。

七零年元月初四日起，到大桥湖中桥没罗【灭螺】七天之玖【久】完成任务回家。

到三月奉命拾砖渣子两天，第一天九担，第二次拾担。又到五里公社补修路二天，在广场挖沟（子）一天。

又到七〇年，挖房【防】空洞前后五个半工。

到五月一号、三号两天办地种棉花。

又到五月十五号锄棉花三天，五月廿四号锄棉花三天。

到五月廿六摘双【桑】叶半天，到六月二号摘双【桑】叶一天。

此人年另【龄】七十五岁了，应该退休了，政府照顾。

吕仙亭居委会负责同志
六九年九月十八号起
挖防空洞到十二月廿号共计拾伍个半工
十二月廿号奉命到五里公社修路
到廿六号白天五个工又做晚工两个半夜一点起
到早晨六点钟收工回来
七〇年元月初四日起到大桥湖中桥
没罗七天之玖完成任务回家
到三月奉命拾砖渣子两天第一天九担
第二次拾担又到五里公社补修路二天
在广场挖沟一天
又到七〇年挖房空洞前后五个半工
到五月一号三号两天办地种棉花
又到五月十五号锄棉花三天
五月廿四号锄棉花三天
到五月廿六摘双桑叶半天
到六月二号摘双桑叶一天
此人年另七十五岁了应该退休了政府照顾

居民钟审安 71年六月4号

这一份请求“政府照顾”让该退休的老人“退休”的报告，实际上是对那个“专政”年代特殊的控诉书。

【史林一叶】

一个 16 岁少女的“家庭出身”档案

任冬林

现在的青少年很难想象，在几十年前，“家庭出身”会给一个人带来多么大的影响。如果“家庭出身不好”，一个青少年在升学、就业以及入团、入党甚至结婚成家等方面都会遭到严重的阻挠和挫折。在我收藏的燎原居委会文革时期的居民档案中，就有一套涉及一个 16 岁少女“家庭出身”的材料。

这个少女的母亲先后嫁过三个男人。第一个男人在 1951 年“被镇压处决”，第二个男人，即这个少女的生父，贫农出身。因与其母感情不合，离异。其母嫁的第三个男人，即这个少女的继父，虽然也出身贫农，还是国家干部，但“有政历（政治历史）及现行问题”。这个少女的外祖父是贫民成分，但被划为“四类分子”。而她的母亲虽然出身贫农，但被认为“表现不好”。1970 年 11 月 20 日，这位 16 岁少女的母亲吴□□的工作单位向燎原居民革命委员会发来了这样的证明材料——

通过查实：吴的前夫余□□，因在土改运动中，群众斗争了余□□的父亲，余不服，怀恨在心，妄图阶级报复，并扬言要杀人，加之平日好逸恶劳，民愤极大，所以于 1951 年 3 月份被我政府将其前夫余□□镇压。在镇压的那天，斗争会的前夕，吴还送去几个饼子、几个蛋、饭菜等给余的父子吃。余□□镇压后，吴还哭了，由于立场不稳，青年小组批评了她，也就吓跑了，后由村政府处理回娘家的。

1970 年 11 月 23 日，16 岁少女的舅父工作单位出具的材料称：吴□□“60 年以前搞一段时间单干，资本主义思想严重，66 年安排在我院，组织纪律差，工作表现一般。”

有这样糟糕的“家庭出身”及“社会关系”，一个人的前途注定是会十分暗淡的。但是，这个 16 岁少女不甘接受这样的命运，她想到了一条出路：自己的

亲生父亲没有问题，虽然十几年未曾谋面也无联系，她仍然大胆采取了两个行动：

- 1、1970 年 11 月内一连书写四份说明自己出身好的自传书递交居委会；
- 2、主动去信找亲生父亲要其所在生产队出具证明其政历“清清白白”的材料。

她写的四份自传书主要是声明“我出身于贫农家庭的孩子，在旧社会祖父叫苦怜怜【连连】，是帮人家（注：即帮佣）出生【身】。因为我生长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由于我没有受过苦，只是到今年，懂了一点事，也知道我生父在旧社会没有读过书。”生父出身贫农，继父出身贫农，伯父出身贫农，“三个姑母都是贫农成分”，母亲出身贫农，舅父出身也是贫农，表哥铁路工人，“社会关系都好”。“只有我外公吴□□，贫民成分，自己不悟（务）正业，理（屡）教不改，后来政府无法救他，才划为四类分子，我不与他接近的。”

四份自传书中，有一份写了这么一段结束语：“经【今】后我要努力活学活用主席的光辉著作，突出无产阶级专政，在整团建团过程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用一切行动来忠呼【于】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紧跟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她去信要来的生父所在基层组织（农村生产队）的第一份证明材料内容如下：

最高指示
认真搞好斗、批、改
证 明

兹有我队贫农社员刘□□，现年 53 岁，住白沙公社……该人历来生长在我队。解放前，很小就跟父亲做炮引（注：指鞭炮引线），18 时，因无法生活下去，就往报母桥王□□家学染匠，出师后又帮王□□做几年工。从此出来又在竹山铺一带做工靠出气力而维持生活，因当地这一带无事做，于民国 34 年往平江去做工，在平江东街踩布，一直干到 1957 年因行业不需要，政府动员后，他才回到我队，从事农业生产，一直到现在仍是以农业为主，我队特此证明。

第二份证明材料则写了“我队贫农社员刘□□”，解放后，分了田、分了山

和房屋。“他和□□□于 1951 年结婚，因双方性格高，才于 1955 年离了婚（当时有离婚证）。现在他一个人在家搞农业，四清时，还是划为贫农。”

第三份材料中说：解放前“这一家是过得很苦，不但靠自己一双手为生，而且还要受三座大山的压迫，算得是上无一片瓦，下无一寸土，到解放后翻了身，过上幸福生活。”

三份材料均盖有当地生产小队和生产大队鲜红的公章，均签有“以上情况属实，可作依据”的字样，时间均为 1970 年 12 月 19 日这一天。三份证明材料均有八名群众证明的钤章，被证明人刘□□（16 岁少女的生父）也作为群众证明人在上面盖了章。

对同一被证明人的证明材料，在同一天由同一个人书写三份，可见索要证明者的心情之急迫，愿望之强烈。难怪该居民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在接到这三份证明材料后，会在上面慎重地批上了“此材料是□□自己写信搞来的，可作参考，我们已发函调 71.2.16。”

为了加强说服力，这位 16 岁少女还把她生父写给她的私人信件也作为证明材料一并交给了居委会。

她亲生父亲这封于 1970 年 12 月 3 日请人代笔写的信中说：

“昨日接到你的亲自来信，我感到无比欢喜。喜的我儿重逢了，悲的当时不应该将我的亲骨肉儿丢掉，使我今天感到眼泪长流，真是多么痛心呀。儿：你对父亲这样怜爱，真是喜之不尽，觉得浑身爽快啊。”

“儿：自你同你母亲去后，我时常惦记在心坎上，只因我当初无能……只要能和我的儿重逢，就是去逝也瞑目了。”

“儿：我这里来信给你，马上将我的简历证明介绍前来，希你放心，我家一根苦树藤，数代清洗（白），没有参加任何反动组织，也是搭帮共产党毛主席从苦海里救出来的，决不要考虑家里的情况（好）吗。”

“儿：我的情况，人好，只是生产队，不太那么好……”

在这套资料中，还有驻居委会整党建党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主任□□□1970 年 12 月 13 日对这位 16 岁少女的鉴定书，其中写道：

“张□□、女、现年十六岁，贫农成分，学生出身。”该同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三忠于、四无限的思想境界较高，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处处事

事起模范带头作用，70 年曾被评为五好个人，出席城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该同志我们是作建团对象培养的，经过考察，该同志本人出身好，但社会关系较为复杂：其母吴□□的前夫余□□（不是张□□的亲父），51 年因道德败坏，作风恶劣系杀人犯被镇压处决。吴□□的二夫刘□□，据说出身好（未落实），（即）张□□的亲父。吴□□的三夫张□□，现系国家干部，在新墙银行工作，有政历及现行问题，据单位反映，可能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但未取证明）。外祖父吴□□，贫农出身，54 年犯重婚罪，划为坏分子。”“我们的意见，可作为积极分子使用，投入社会主义建设，建团暂不适宜。”

这套档案中，还有这位 16 岁少女的外婆 1971 年 4 月 19 日写的自传，其中提到她这个外孙女：张□□，年 16 岁，贫农成分，学生出身，现在本县糖精厂工作。

由此可知，这位 16 岁少女通过自己的努力，总算在那个注重“血统”、“家庭出身”的“红色年代”争取到了招工的机会，但仍未解决入团的问题。那些由“家庭出身”、“社会关系”带来的阴影，也许要一直笼罩在她头上，直到被改革开放之风吹散。

【史林一叶】

地主父亲原来是抗日烈士

——外调中的意外发现

任冬林

在我收藏的燎原居委会文革档案中，有一个女性居民的材料十分特别，她叫刘菊英，华容插旗人，家庭成分地主。

1969 年 10 月 24 日，刘菊英在《关于我出身在旧社会里娘、婆二家的详细经过》中写道：

我出生于 1926 年 5 月 29 日。至 1932 年，七岁儿童，1933 年上小学一年，八岁，1934 年至 1940 年十五岁，在家学针线纺纱织布做家务。1941 年十六岁出嫁同高天民结婚，高的成分贫农，出身学生，现年 45 岁，现住注滋口镇，解放

前在注滋口教小学和做经济卷烟过活。49年元月高天民的哥哥高天浩在汉口当伪警察局长，该弟天民就去汉口，他哥哥介绍弟弟当（派出所）伪副所长三个月。因我有病去汉口治疗住了十天就回家。同年将近解放不久就一个人回到注滋口，仍教小学至1952年。52年3月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高天民被捕，人民政府根据高的罪行判刑十五年，后就业在西湖农场。为了分清敌我和生活来源，53年我向当地政府申报请求离婚，只隔一年时就由华容县人民法院判决离婚了。其高天民的哥哥高天浩于1952年3月被捕，同年五月经华容法院判决镇压。53年本人29岁。

另外，高天民在农场改造时，66年7月天民的侄儿把我所住××的地点告诉了叔叔，天民就知道我的住址，因此天民在改造中对我来了一封信。但信中所说的事情，高表示道歉，对不起我，说他在旧社会是一条寄生虫，吃了人民的血汗，此信经过搬运服务社装车工人□□□阅读，他可作证明（注：因刘初识文化，故找人读信）。但我与他突【脱】离了夫妻关系，我就冒（注：即有，没有）回信。

下面她还写了自1954年后迁居来到此地，经政府同意“提篮子做小生意”，“粮食局挑土方”，及经人介绍的先后三次婚姻（前两个丈夫分别是病故和感情不和离婚，第三个丈夫“出身贫农成分，种田”，“到69年为止”）。

接下来她以十分谦卑的语气（这是当年接受“无产阶级专政”，不敢“乱说乱动”的人们不得不采取的态度）写道：

娘家父亲，出身教书，成分地主，于1944年被日本拉夫饿死。他的姓名刘舟山。母亲项春桂，女，贫农，出身家务，于1945年在华容插旗病故。

以上我出身情况详细向党和广大革命群众老实交代，根据我的具体情况决定我的成份，但我毫无意见，忠实地接受广大群众的教育和帮助，保证在社会上从新做人，以上情况希望各级领导深入了解，如有出入，后果自负。

1969年11月15日。燎原居民革命委员会和工宣队联名写出对刘菊英问题的《综合意见》，内称：“刘菊英，女性 今年43岁 地主成分，家务出身，初识

文化，汉族。原籍华容县插旗镇人……”“社会关系较为复杂，即娘、婆二家关系复杂，又找过多个男人。娘家父亲刘舟山，地主成分，出身教过书，1944年在日伪兵内工作死亡（但职务和死亡均不明）。”“刘菊英不但社会关系复杂，而且来历不明，特别是土改时定为什么身份还不清楚，尚待查证。”

在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气氛下，像刘菊英这样“地主出身”、“社会关系复杂”、“来历不明”、“土改时定为什么身份不清楚”的居民，自然就成了重要怀疑和清查对象。

1969年12月，该居民革委会《三查重点对象》表中，已将刘菊英作为“漏管地主分子”列入首位。

1969年12月20日，该居民革委会《重点建档人员编号登记》造册中，刘菊英被作为“漏管地主分子”编在第5号。

同年，该居民革委会《三清人员基本情况登记表》也将刘菊英作为漏管地主分子登记在册。

这个原本就背着沉重的家庭出身包袱，个人生活也屡遭不幸，没有文化和专业技能的中年妇女，眼看就要被打入“永世不得翻身”的“专政对象”行列中去了。

1970年元月20日，城关镇城南革命委员会配合燎原居民革命委员会向刘菊英家乡的革命委员会正式发出了“索要证明材料卡片”：

华容县插旗公社革委会：

请转 组织 为我处 刘菊英 写一证明材料（详见原件），写好后请证明人所在之组织证明材料的可靠程度即附原件转回是荷。

回函地址：岳阳城关镇城南革委会

机关盖章

1970年元月20日

由该县城关镇城南革命委员会“三查一清领导小组”1970年元月19日所写的向对方索要证明材料的提纲是：

1. 刘菊英的家庭出身是什么？刘本人成分是什么？
2. 刘菊英的主要亲属、社会关系（父、母、兄、叔、伯等）的政治、经济状况如何？是否有三外关系，杀、关、管、逃的？
3. 刘与高结婚和离婚时间？刘菊英在当地有无民愤和罪恶？

从这提纲可以看出，调查的目的明显是要找出刘菊英的亲属和本人的政治历史问题，以便把她划入“专政对象”行列中去。

不料，事情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1970年5月31日，刘菊英家乡华容县插旗人民公社同福大队革命委员会发来了“转递证明材料卡片”连同有关刘家情况的证明材料：

证 明

刘菊英娘家地主父亲刘州山，读书人，被日本鬼（子）捉到华容，要刘州山谈国家事情。刘州山不肯说，刘说：我淋【宁】做刀下鬼，不做忘【亡】国奴，由日本鬼子犬咬死在华容。母亲病死在插旗。胞兄刘□□过去在插旗当过乡队副，解【改】造回家，住在钱粮湖六分场劳动生产受管制。叔兄住在同福九队，刘□□、贫农、种田，侄子五个，都在同福九队住，种田，都是贫农。

特此证明是实

证明人 吴立钧 70年5.8

此材料可作考虑（华容县插旗人民公社同福大队革命委员会盖章）70.5.25

证 明

刘菊英家地主成分，本人文盲，在家务农。

父亲刘洲山，地主成分，读书人，1943年尤【由】日本鬼子作【捉】去华容，批【被】犬咬死（要他说国家当〈时〉情况，他一言不语）。母亲44年病死。叔叔刘□□平【贫】农成分，种田去【出】身，无其他历史。伯伯刘□□未解放早以【已】就死，无后人。兄刘□□，地主成分，劳改八年，本人在钱粮湖六分

场管制劳动生产。

刘菊英于【与】高天民结婚 43 年，值【直】到解放，以后我不明时间，至今我不明她住此地点。

特此证明

证明人刘墨香 1970.5.30 号

此证明可作依据（华容县插旗人民公社同福大队革命委员会盖章）70.6.6

上述第二个证明的证明人刘墨香，据了解当时还是一个“管制分子”。

这两位证明人所说的“刘州山”和“刘洲山”，也就是刘菊英的父亲“刘舟山”。在他们的笔下，尽管只有“我淋【宁】做刀下鬼，不做忘【亡】国奴，由日本鬼子犬咬死在华容”，“被犬咬死（要他说国家当〈时〉情况，他一言不语”等寥寥数语，一个英勇不屈的爱国志士的形象已经跃然纸上。显然，刘舟山的英雄事迹在故乡当地是深入人心的，虽然经过了从土改到四清再到文革的历次政治运动反复冲击，当地农民并未因他那个“地主”罪名而将他视为“反动分子”，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全面专政”时期，他们（包括“管制分子”）也照样以纯朴的农民本色如实写出所了解的这位抗日烈士的事迹。这才叫“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然而，即使有了这样由农村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出具的证明，当地政府也并未考虑将刘菊英的父亲追认为烈士，将刘菊英改定为“烈属”。刘菊英在 1971 年 4 月 3 日再一次书写的自传中仍然不得不按以往的习惯这样写道：

“刘菊英，女，现年 45 岁，出生 1926 年 5 月，家庭成份破产地主，本人出生【成份】家务，文化程度文盲，原籍湖南华容插旗镇，现住燎原居委会先锋路居民点。1954 年 7 月由华容注滋口来……解放前稍微有点地土，由哥嫂掌权，已破产。解放后本人土地全无，靠爱人过生活家务劳动。”

不知现在当地对那位“宁做刀下鬼，不做亡国奴”，壮烈牺牲于日本侵略军狼犬血口之下的可敬的“地主”，有没有重新评价？

【故纸堆】

一个城镇贫民对“单干自发”的交代

任冬林整理

按：湖南的城镇贫民刘武建（化名），完全靠自己的劳动艰难谋生，却被视为“资本主义复辟”，“挖社会主义墙角”，处处受到限制、处罚、打击，不得不在学习班里接受批判并做出对自己“单干自发”的认罪交代，读到这交代中“我幸福地生长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是多么自豪”这样的文字，真令人啼笑皆非。

说明：写交代人刘武建（化名），湖南城镇居民。

我叫刘武建，男性，现年 35 岁。家庭贫民成分，家中八口人……

56 年——62 年，在××港务局做搬运工。因病自动离职。

62——63 年，在家搞单干，投机倒把，贩卖白菜、萝卜等东西（1963 年 8 月，罚税 338 元，全部交清）。

在 62 年投机倒把，我在火车站煮萝卜、白菜和藕等东西卖。另外贩了一些（约 30 合）烟票、50 尺布票、粮票 60 斤。还搞了小五金修理，打了半年气枪（注：指开设气枪打靶小摊），炸了两个月米炮（注：指走街串巷加工爆米花）等等。63 年 8 月，市管会根据上述情况，去【出】税 338 元，全部交清。64 年——65 年，打米炮，通过发执照，每月交税 5 元，其中包括管理税一元。65 年 9 月，补税运动，补税 75 元，以【已】全部交清。

66 年起，至 69 年 9 月，在这三年九个月中，基本上是在家里补凉鞋、拖板车、打米炮和在家内休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有时【因外边】搞武斗，不能外出做事，只得在家内休息。有时候天热，我即上街补凉鞋，有时候补凉鞋冒【有】得生意，我又去拖板车，有时也炸炸米炮。69 年 8、9 月，我的手被打伤，休息两个多月不能做事。10 月份手好了，被介绍去搬运社做工，直到现在（总共休息八个月的时间）。

总之，在这三年九个月的单干期间，平均每月大约能收入 50 元左右，维持家内生活。

自 62 年自动离职以来，我是翻身忘本，忘了旧社会的痛苦，大搞单干自发，挖社会主义墙角。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我幸福地生长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是多么自豪。但我却忘本变质，思想上丢了三忠于、四无限的思想境界，做了害人开始，害自告终。单干就是资本主义复辟，这是两条道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生死斗争。我这种单干自发，完全是无政府主义的搞法，无政府主义是通向反革命的政治桥梁，我是很危险的。

今后，我坚决痛改前非、脱胎换骨、重做新人。我感谢共产党和毛主席，这次三清三反学习班很及时，好得很，好极了。

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我一定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为建设社会主义，贡献出自己的一切力量，争取早日实现：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

具自传人：刘武建 1970 年元月 14 日

【故纸堆】

一个乡镇理发师的检查交代

任冬林整理

说明：写交代人刘亚雄（化名），湖南乡镇理发师。

刘亚雄，男性，现年 46 岁，家庭成分贫民，文化初小，政治面貌群众，职业理发，沙市荆州公社范家大队刘春生产队人，现住先锋路 82 号，家庭现有七口人，新旧社会，没有参加过任何党派组织。1924 年 6 月在农村出生，因为家贫讨饭，父亲在 1926 送我到沙市亲伯伯处，抚养到 1933 年伯母死了，我就有 9 岁了，就上学读书 3 年。到 1936 年，就跟伯父学理发，到 1941 年底，我伯父在沙市病死，我就开始过流浪的生活。在沙市逃难出来，挑担理发，或剃乡头，到 1946 年上宜昌去，在长生堂理发店，老板刘顺畴名下参师和帮工。2 年后，到 1948 年回到沙市又挑担和帮工理发，到 1952 年，就到荆江分洪（工地）去理发 3 年，又到 1955 年底，迁来吕仙亭居委会（燎原居民革命委员会的前身），挑担理发。

到 1956 年元月份，就公私合营。到 1962 年，我要求下放，回沙市，拿下放金两个半月，币 95 元，没有下放证和其他证明，因此没有上户口，又到这里在城南把户口登上，就开始单干挑担理发。到 1964 年，我到专署去找接待室，反映我的情况，要下放证和工作安排，我内心的（想法）还是想要七年的公零（工龄）下放金，结果，专署写信，要我拿信到福利公司找领导，要他改【解】决问题。

结果公司里的秘书彭湘岳，说你还是在街上理发，又没有人不要你理发，在【再】又说我们公司里，没有什么证明和工作。因此我就在吕仙亭街边摆摊理发 3 年多，在这短时间内搞单干，我的税和管理费都是上缴了的。到 1966 年，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们就走上联组理发，拿多劳多得，百分之 45 上缴。又到 1969 年，5 月份办学习班，是宣传队结合办的。在学习班上写检讨，接受批判，又决心退还 95 元下放金，还定保证今后不再重犯，重新做人，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在当时学习班上，同学们很多都说，我的家里负担很重，又是一个痼病，可以留单位做事。结果散会时，又说照党的政策办事，继续下放，因此，我又到沙市、又到农村，都不同意落户，只好回来，又去要求领导。我们刘主任说，要我到居委会签意见和盖章，结果胡主任替我签了意见又盖章，拿去又不行，说意见签到【得】不好，说签的照党的政策办事，就应该（不）下放。又拿来签二到【道】，胡主任要我到城南革委会来签，结果是一样的，还是不行，因此我的态度来了，就以为自己是三部分人，不怕你，就和刘主任大吵大闹，就回来搞单干，6 月份半月的工资又不把，有的又把了，又上了班。后又在七月份，有李秋山同志来我家，要我找主任再签意见。好，我就到居委会找主任，不在家，去医院生小孩，曹秘书就替我签了，说我家里实在困难，要我们领导安排。李秋山同志替我送去把刘主任，以后到九月份去问他，又要我写一份检讨，去学习。学习了三夜，把我当典型来批判的样子，那时候，我就有小资产阶级面子，又不去学习。到十一月份又把我叫去，在学习班学习了廿多天，写检讨，接受批判，又说服务站不同意，又写一张证明叫我到居委会，胡主任说，要我找城南四向办来解决。刘站长要我去劳动，我有痼病，不能搞劳动，以后刘站长还是要我回单位去理发，又去将情况说了，他还是不行，因此，我就边单干，边要工作，因为家里很困难，在这个十二月份内，只做了几天的事。到 1970 年元月二号又听报

告，宣布了名字，又要我来城南学习班里学习，我心中又是高兴，又是愁。高兴的是学习以后，会安排工作，愁的是十二月份未做事，又继续到元月份，又不能工作，连家里值钱东西，都没有卖的（了），实在是很难。

但是自己，并不向困难低头，下定决心，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精神，在这次学习中，坚决学好，彻底挖掉资产阶级根子。尤（由）于我是旧社会里（过来的）人，思想是很复杂的，再加上中了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的流毒，就满脑子里资产阶级思想作怪，在六二年要求下放，就是为工资钱太少了，不愿干了，看开放市场了，想搞单干的钱多，又可得一批下放金的钱，又想把儿女带到沙市去，找到好的工作，我就好过幸福生活，这都是我内心里的打算，资产阶级的腐化思想作怪，只顾自己，只故（顾）自己一家享受，不故（顾）国家建设。还想挖社会主义墙角，我还一贯态度生硬，骄傲自满、目空一切、对与【于】任何人，一点不好，就是相骂，这都是我的资产阶级思想很深，又中了刘少奇流毒很深，像这样发展下去，就一定走到灭亡道路上去。在这次学习班，来得很及时，也很必要，非常正确地挽救我们，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在这十天学习中，和听李主任的报告，和掌握学习的几位同志的辅导，使我清醒过来，我所犯的错误，是不可挽救的，我一定要老实诚恳，要求三清三反的负责同志，对我严重斗争和批判，还要求掌握学习的几位同志，对我要批深、批透、还要批痛，使我的思想扭转过来，一定要痛改前非，从新做人，一定为社会主义立新功，来报答党和毛主席的深恩。

敬祝

毛主席万寿无疆

刘亚雄呈

1970年元月13日

【故纸堆】

一个家庭妇女的历史交代

任冬林整理

说明：写交代人龙秀英（化名），湖南城镇居民。

养父龙□□在 1925 年和 26 年在伪警察局做事，搞什么事，我不知道，因我那时才六七岁。

1927 年到 1933 年为止，是开聚贤旅社，后因亏账就没有开了，那时我有十二、三岁。接着搬到乾明寺住家，父亲告【教】书，是告【教】古书。

养母□□□是一贯吃长素的，是个地地道道迷信专家，61 年劳改一年放了。龙家（养父家）还有个弟弟叫龙□□，是贫农，现年四十几了，在家种田。

养父龙□□在 1948 年底死去。

养母是 1963 年死去，这是龙家情况。再讲李家情况，生我（的）家庭。52 年，李□□（生父）第二（次）把我找到，我只回了两次家，听说还有一个妹妹都没见过面，妹妹是嫁给乡下农民，听说姓彭。妹夫（见）过一次面，李□□（生父）是一个贫农。

再又讲刘国良（丈夫）家，刘国良是工人成分，集体参加伪国党，是 48 年加入的，其他的都没有参加过，可查。

刘国良弟弟刘国栋是个开汽车的。49 年三月份便离开了家，一直到现在死活不明，（是否）在台湾也不知道，一直到（现在）没有通过信件。

刘国良父刘□□是个工人阶级，是铁路上一个搬（扳）道的。

我记得是 49 年 3 月份参加老母教（就是现在的一贯道），婆婆也参加了，一般的。49 年解放后，便向政府交代了，没做任何处理。

以上一些情况，（是）实实在在的交代。

我本人任何坏事都没参加过。读了四、五年书，是在姓龙的父亲跟前读的。解放后，当过小组长，妇女会主任，居委会主任，调解委员。我自己本人是想为人民服务，可是我的两家一些问题，把我背上一个大包袱，今特请彭、赵、任、白工（人）宣传（队）四位同志和广大的群众们代为分析。

现在我在刘家生有二男四女，三个有工作，一个响应党的号召知识青年下农村去，现在有两个小孩在读书，一个初中，一个高小，这是我的一生。

1969. 10. 17. 上午龙秀英

【故纸堆】

一个“反革命子弟”的检讨书

任冬林整理

说明：检讨人胡继文（化名），湖南农民，初中文化。父亲系国民党军队投诚士兵，土改时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当初欢迎国军官兵投诚时承诺的是“放下武器，既往不咎”）。

我是反革命分子的子弟，因为不学好样，干尽了坏事，今天我以无比沉痛的心情反省自己的错误，并向全体贫下中农同志作出公开的书面检讨，现将我的犯罪事实与反动言论分别检讨于后。

甲、 犯罪事实：

一．在县一中读书时，与一些落后同学打成一片。事后，（怀疑）他们写了反动标语，也牵涉到我。幸亏党的英明，才弄清了是非，这是我不学好样的具体表现。自己不进步，也不靠拢进步的同学，这是极端错误的。

二．逃跑君山围垦，不爱劳动，目无组织纪律。

三．对现实不满。在新路队的墙上用粉笔写的“举世凡人皆鼠目，何期贫贱不认亲”极端错误的滥调，在群众中影响极坏。

四．党曾一度培养过我，只怪自己不学好样，辜负了党对我的培养，不好好在家劳动，争取自我改造，竟然盲目外流到江西。

五．外流后，为了自己的工作，居然欺骗党和领导，隐瞒父亲个人历史，隐瞒家庭出身，更严重的是自己改名换姓。

六．与反革命分子的父亲不能彻底划清界线【界限】，自己外流后又把他接出去逃避改造，这是令人所不能容允的。

七．目无法纪，反革命分子的父亲病了，又偷盖公章，为他治病，骗取了公费医疗，浪费了人民的财产达一千余元之多，这是一个极端严重的错误。

八．回家后，又不老老实实生产，靠拢领导，靠拢贫下中农，而专门与一些牛鬼蛇神，国民党的残渣余孽打成一片，这是相当危险的，如果再不回头，必将

陷于绝境而不能自拔。

九. 搞迷信活动，曾到火架岭敬过神，打过神水，这是复辟四旧的具体表现。

十. 为复辟四旧作舆论准备，我到处谈今博古，为帝王将相歌功颂德，为才子佳人涂脂抹粉，为游客侠士吹嘘捧场，这完全是违背发展规律的言论，错到了万分。

十一. 我队分牛血，领导已作了决议，我却硬要推番这个决议，操纵权利，硬说要分给某某，并借此挑拨少爹与□□的关系，使其不团结，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错误。

乙、反动言论

一. 在□□家里坐，我向□□说，我在江西受了开除处分，我有点不服气，这个处分太重了。□□说，哎，共产党的事我也看破了，我也不反对他，还是在屋里种田的好。

二. 在□□家里坐，□□说，你年纪轻，不错，有出息。我说，我冒【有】得用，还不如你们老班辈。他说，我虽说老了，也还不怕，我进过军校，当过团长，国防部还有案呢，到将来我咀角（嘴巴）就是证明。我说，这只有我里就冒得一点什么，他说，不怕啰，只要我有饭吃，还忘记到你了。

三. 在A家里坐，谈到中印边界问题，我们就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我说，报纸上说，美帝国主义侵华计划由半月形包围圈发展到了环形包围圈。A说，东有日本、朝鲜、台湾，南有越南，西有印度，北有蒙古苏联。B说，这打起来，就很危险，真是四面受敌。A说，最近和印度打了一仗，B说，胜败如何，我说，照报纸上看，是我们打胜了，缴获了他们许多东西，还有他们红十字会的人在这里领伤员。A说，这也难得说，我哩就冒得损失啰？

四. 在我家里坐，A说，我有一点事和你商量一下，他说要批判少爹，我想和你写□□一张大字报，转移一下目标，我也冒拒绝。事后，我告诉□□叔（即少爹），被他骂了一顿，我也就冒写，就向A拒绝了。

五. 在A家里坐，A说伤脑筋，□□冒离婚，如今又有了喜，B说，你如何晓得，他说，今天来了一个信。他把信给我刚看了一半，胡□□同志（治安员）就进来了，A一把将信抢走，我一连说了好几遍，要他拿出来给少爹看，他总不听。我们当时只好扯别的，谈到了何谓政治，何谓社会主义，何谓修正主义，为

什么两国的书信叫照会等等一些深奥的哲学名词来，以为自己了不起，看到干部水平低，故意谈这些来讽刺打击。

六. 在 A 家里坐，谈到了印度尼西亚政变的情况。A 说，他们多次冲击我大使馆，还打人，我们中国真冒得一点人气了。我说，我们中国为什么不打一个小国家，还怕打不赢了，真是太冒得人气了。

七. 我在□□家里坐，有人问我，□□出来造反行不行，我连忙说，行、行、行，他是好的，这是为坏头头捧场的表现。

八. 今年我队选上了胡□□当队长，我就心怀鬼胎地去向他爱人道喜，说恭喜你当了队长太太，让他【她】去和胡□□吵闹，以达到我扯垮生产队的目的。

鉴于上项事实，我今天已深深地认识到它的严重性，危害性，我应该猛省回头，痛改前非，重做新人。如果再不悬崖勒马，顽固到底，那时摆在我面前的必将是死路一条，自取灭亡。所以我今天再一次向各级领导和全体贫下中农同志承认错误，并作出自我改造规划，请监督执行。

一、痛改前非，重做新人。

二、靠拢党，靠拢领导，靠拢贫下中农。

三、虚心而诚恳地接受各级领导和全体贫下中农对我的监督。

四、与牛鬼蛇神和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彻底划清介【界】限，决不再到一起鬼鬼祟祟。如今后发现我再和他们在一起，请求从严论处。

五、今后不论对任何人，决不再谈今博古。

六、老老实实生产，不乱说乱动。

具检讨书人 胡继文 1968 年 10 月 24 日

【故纸堆】

一个“地主分子”的交代

任冬林整理

说明：写交代人黄梅贞（化名），女，湖南岳阳农民，土改时被定为“地主分子”。

黄梅贞，今年 56 岁，娘家父亲黄松柏下中农出身，种田。母亲冯秋香娘家无后人，父母都在，现有七十八九岁。哥哥黄梅贤今年 59 岁，出身种田，大舅侄……都在家种田。我廿一岁由胡菊初之母亲余姑娣与周祥云之妻胡汝姑二人介绍与胡平和订婚，廿二岁结婚，结婚后半月他仍回原部队去了。

我来胡家有水田壹石式斗三升，是 1934 年置的结婚的。1936 年那年九月又置次五爹四斗，去洋壹百式拾元，共有水田壹石陆斗叁升，母亲有命田壹石，伞舖子附近田，六斗旱地廿八块，烟贝塘附近附坟田四斗，都是由母亲掌管，所收租谷除少数把给满姑以外，其余都是把给良才母子吃了的，母亲在我一起过日子，吃饭穿衣以及零用人情客往往都是由我负担。同年十月间时候，胡德徽是我重堂老兄，在大马家患病送到我家，母亲要我去娘家，恐怕传染病，我就去了，不久他就死了。母亲经手用了卅多块钱，这些钱都是母亲自己借的。他在外共有十一个月就回来了，母亲就问我要，我向他耍，他答应没有，母亲就将烟贝塘附近水田四斗卖掉，我们也没有管，只到去年下半年，良才说我卖了他的长孙田，欺压了他。我去年腊月就到八字童家问我童大娣，童大娣答应这四斗田是唐文公的附坟田，德徽是卖给你们了，但是还有一点手续未清，所以送到你们家里（指胡德徽那次病后送到他们家）。童大娣还在，现住童宅二爹屋里，现年八十四岁，可问，为恐日后老了死无对证。

（丈夫）他回来没有，还将我金箍指一对，金环子一双拿去换了，他做了几次布生意。在他未回以前，我还整了屋，换上堂屋的檐领加瓦，在那时是吃租谷的饭，剥削了农民。到二年九月，我地沦陷，我就跑兵到眉山冲许家，又转八字童家童凤同屋里住。1938 年，他就在新开乡公所自卫大队当副大队长，又到第二年 1939 年 5 月，日寇进攻沙河北岸，新开乡公所开赴饶村伪县府，我就同到饶村住金背李家李松二爹屋里，他也住了几个月间，随后他又在伪县府自卫大队当副官，只有十块钱壹个月，到了十一月份的时候，薪饷就增到三十六块钱壹月。他随后又在大队当中队长，又在支队部当副官，都是只有这些钱壹月。他在公家干事，我在比较安全一点的地方住，那时刚刚生我的大女儿。母亲是 1940 年 9 月间过去的，家里只有三个人，过日子生活很简单，积蓄一点钱，大约二百块钱就放在驻潼溪街的新开乡公所投盐资。赵笃初晓得了，就要将他陈斋公坟上

陷区的田壹石定要卖给我们，价钱是壹百八十元，我就买到了。到 1942 年，他又调新祥当伪乡长半年，同年又调箕口当伪乡长半年，共一年。1943 年元月，又调伪县府警察大队附时间比较长一点，有两年多。我就在朱公桥西沙湾住，喂猪、滕纸和一些家务事，他就同夏会计去江西樟树镇买盐，私人也带些棉花去，带些私盐来，一连三四次。到 1945 年 2 月间，新四军王正司令到了芭蕉坳，将我捉去（他在江西未回来），在我家搜了一回，将只拿去一箩米式拾肆块钱，也没有别的东西。他们轮流问了我几回，我将盐仓积谷仓告诉了他们，就放我回来，24 元钞也把给我了，米也还了我壹石谷。新四军开走了，伪县府又开来，我也没有怪扳我的人。不久，他就由江西回来期间，置余海涛田式斗，四月间又置方□□田壹石四斗，方□□田叁斗，共壹石玖斗，都是陷区冯家冲附近的田，共去【出】价洋二百五十元。1945 年 5 月他又调箕口乡伪乡长，9 月，日寇投降，十月间他就回来住。张幼龄屋内手内还有式百多块钞，同年六月在箕口乡买一条病马只出洋 15 元，到冬月间卖掉得洋 120 元，共有四百块钱左右。妹丈陈德志光复后，没有本做生意，他就托张幼龄替我说，要我替他舅爷（即她的丈夫）说，要与我们合伙做染铺和电【淀】粉子生意，我们也就同了意，随将钱拿去四百元。1946 年 2 月又置刘家坳大塘弯之屋基去了三百多块钱，陈德志一时拿不出来，我又将其附近之田式斗、老屋胡家之田六斗卖落得价 144 元，陈德志钱陆续付来。钱水低落一大半，只付本没有交赚资反去本一大半。1948 年 3 月间，做大塘弯屋又将老屋里的田卖去 8 斗三升，送给良才结婚田壹斗八升，还欠方东海瓦匠工钱壹拾五石（谷），我在朝磐之德贞手内借谷五石，托方东海在道人咀寿大爷手内借谷拾石，由东海自挑去，胡成功借光洋 17 元，当年就还了。

1949 年解放，1951 年土改时水田仅叁石，六口人吃饭，当将全部剥削财物退还农民，政府另给碧公祠堂屋两间，水田壹石陆斗，旱地大小八块。在当时生活无着，就讨了几天饭，随后又在娘家父亲左（注：换）了几块钱做川胸【芎】（注：当地一种用开水冲的饮料）生意，田是自己种的。第二年复查，他就去人民法院守法，生活困难，又讨了几天饭。随后又由我父亲代借了几块钱给我做小生意，田就由我娘家叔伯兄弟等代耕。他劳改守法到第二年五月间回家，1954 年又生得乾，一家七口人老老实实守法一直（到）1967 年 12 月由大塘塆上生产队搬到新红生产队，总是老老实实守法，不乱说不乱动。

但是婆婆老老的事都是家务事，恐怕看起来烦琐人，另把他【它】概括一下。

我到胡家来，结婚后只有两年零两个月就沦陷了。我来时，只有水田壹石式斗三升，我随后又置四斗，共田壹石陆斗三升。母亲有命田壹石的租谷由母亲经手把给满姑娘一小部分，其余都是把给马三娘子母子吃了。1937年下半年，因德徽死在我家，欠了些葬费卅多块钱，就将烟贝塘四斗附坟田卖掉，剩六斗田廿八块地。土改时田改了，旱地廿八块由良才卖给邱家咀的李太久，不知多少钱，我晓得后，因太困难也要了五块钱。母亲命田沦陷前后都由马三娣收用（1938年7月间，良才他父亲回来，他夫妇用心将良才过继与我，并请了一桌客，良才将近十三岁），只有沦陷的那年，佃户李和顺（李和顺老佃户，住邱家咀）送在道和冲，母亲把给刘家舅父。沦陷后，我的田也是由马三娣母子收用。我地沦陷七年，日寇四次进犯长沙，都是由洞里经过，我也是东躲西躲。他起初只有十块钱壹月，十一月份后增到卅六块钱壹月，因那时人口少，稍微积蓄些钱和做生意，赚些钱，在陷区置些田，吃剥削饭。我在前方住在一边，一没有打过牌，二没有赌过博，也没有办事的人到我家里来。我住得最久位蓝家坊叶家两年多，饶村金背李家一年多，西沙弯附近一年多，芭蕉坳附近林家一年多。我一直到现在，到后来得【都】在贫下中农监督下老老实实守法。

1970年3月10日黄梅贞

【故纸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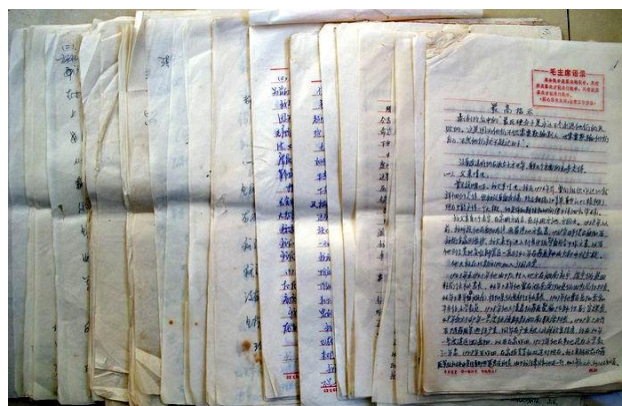
一个“摘帽右派”的交代

任冬林整理

按：作为“专政对象”的各类“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是千差万别的。这几篇交代反映了一种随大流参加群众组织、站在一派立场但表现并不积极的情况。

说明：写交代人胡应强（化名），湖南省“摘帽右派”。这是从他所写的14份交代材料中（其中只有4份是完整的）选录的，这批材料均未标明年代，有的

结尾处仅标有月、日，但从它们涉及到的一些事情的时间叙述（如“到 69 年 11 月份我回家探亲前和今年 2 月上旬”），及这些材料均紧密围绕“一打三反运动第一阶段”这一时代背景交代的内容来看，可以断定写作时间为 1970 年 3 月左右。



最高指示

剥削阶级中的“最死硬分子是永远不会承认他们的失败的。这是因为他们不但需要欺骗别人，也需要欺骗他们自己，不然他们就不能过日子。”

没有改造好的右派分子胡应强有关几个方面的初步交代

（一）. 父亲情况

首先说明一下，我父亲情况，我在 1956 年，曾向组织作过比较详细的交代，但我没有留底稿，现在相隔了十多年，有些记忆模糊了，现在只能交代一个大概，他具体的职位和时间很不详细和准确。

我父亲有三个名字，在家用胡有田，在外用胡有天、胡子云。1938 年以前，我听说他在××龙湾画眉湾地方教书。1938 年日本侵占××后，我们全家到长沙，我父亲即进入长沙警备司令部作文书，以后，他到了贵州安顺师管区一直到 42 年在蒋匪军中由少尉升到少校。他大约在此期间内加入了国民党。

1943 年至 1945 年，他由部队转入地方，在湖南新宁、绥宁伪县田粮局任秘书长，46 年上半年他曾在湖南衡阳县伪田粮局任科长，46 年下半年在湖南桂阳伪县府任秘书长，1947 年他曾在××原和平乡任小学教员，1948 年他到青岛伪蒋匪整编 54 师任副官课长，48 年底到 49 年一季度任该师驻湖南联络科长，1949 年 5 月前后随蒋匪军逃往广东，同年在广东被人民解放军俘虏，约在 50 年一季

度遣返回××，以后在家作田，1957年他在本地民办小学教了一年书，1958年后作田，在家接受劳动改造到现在。我父亲解放前在蒋匪军政机构中具体有哪些罪恶或血债，由于我经常没和他在一起，加之年纪又小，所以不知道。

（二）我的简历

我出身于1934年9月（解放那年16岁还不到）。

1941年我七周岁时，在湖南湘乡难民学校读书半年。

1942年我八岁时在家没读书（由湘乡住后，43年搬新宁）。

1943年我在湖南新宁县立小学读书半年，失学半年。

1944年我在绥宁城关保校读书半年，失学半年。

1945年上半年失学，下半年日本投降后，到绥宁县师附小读书。

1946年回××老家，失学在家。

1947年入本乡高小读书，同年底毕业于本乡高小。

1948年进入××县立初中读书，到1949年5月。

1949年6月至8月8号前，我住在姨妈邹吴氏家（中农）。

1949年8月8号我报名考入“湘北建设学院”，学习二个月后，同年十月份分配在××县新墙区搞秋征、减租、减息等工作。

说明：1947年我生母死后，由于继母虐待，因此除在学校外，寒暑假期间，我大部分时间住在我姨妈家，49年我参加工作前即住在她家。

（三）关于1958年我的资产阶级右派主要问题的交代

由于时间相隔了十年，我没有留底稿，所以很难详细全面的回忆起来。但是我的档案里是很详细的，我愿意再次接受革命群众的批判，请革命群众到革委会查找即可完全详细，我一定老实接受革命群众对我的右派罪行的批判。

我现在只大约记得，我在58年成为右派时的主要罪行是：

1. 在日记中写了反动诗歌（日记是我主动交出的），这些诗歌主要内容是对党不满，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大毒草。

2. 在反右时我说了很多的反动话，放了很多毒箭，攻击了三反，镇反，说解放后的东西有些还不如解放前的质量，攻击了统购统销，夸大了工农生活差别……等等，很多很多。现在详细记不起了，总之是攻击了党的领导，不要党的领导，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再声明一次，我现在记不全了。

另外反右时也批判了我学农业，不安心工作，想回家搞资本主义自发的坏思想（这一条是不是附带的我记不得了）。

对于 58 年反右斗争，我之成为右派是由于我的确实的反动的资产阶级言行，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和我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这是我的认识。

我的错误，是当时没有把我的主要右派罪状抄下来，以便经常对照检查自己，坚持长期不断的思想改造。

现在我真心请求革命群众到革委会把我的 58 年档案资料，把我所犯的右派罪行抄来，重新、彻底给我以大批判。我一定老实接受革命群众的批判，使我能在今后真正用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能重新做人。

（四）关于我退出大联和参加大联情况的交代

1. 1967 年 9 月 30 号，我参加了我队炮联委五七归口战斗队，到 68 年 3 月 6 号晚上，五七队开会传达炮联委要在 3 月 7 号反夺权时，当时我是不赞成夺权的，思想上考虑到反夺权是有问题的，但我当时不敢提出意见。为了避免将来发生问题时联系到自己，另外我也怕发生武斗，所以在 3 月 6 号晚上五七战斗队会上，我声明退出大联。从 3 月 7 号起到 8 月上旬前，我没有参加炮联的战斗队会议和其他重大镇压八.二三的活动。

2. 7.31 事件以后，炮联以武力镇压和赶走了八.二三造反派，我在八月上旬重新参加了炮联委，当时动机有两个：一个是看到炮联将要在红山掌权，自己如再坚持不参加炮联，就说明自己与炮联对立，自己是右派分子，加之家庭出身成分是地主，将来就可能挨整，为了保自己过关，所以参加了炮联委。参加后，从 8 月到 12 月上旬前，我在会上是极少发言的。另一个原因是，当时红山白色恐怖较重，怕挨打。

3. 12月份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队后，经过学习和听了解主任报告，思想上初步认识到炮联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八.二三是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很明显自己是站错队了，为了表示自己要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实质上思想上也是为了保自己过关，所以我在12月22号声明退出大联（即炮联委），参加八.二三。

我为什么两次参加大联又退出大联呢，我不是为了革命，主要是一个私心作怪，总想逃避激烈的阶级斗争，力图保自己过关，思想上只有个人，没有革命，这就是我没有改造好的右派思想的表现。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我违背了毛主席的教导，没有参加八.二三革派，所以就一定倒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这是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大错误，我向毛主席请罪。

（五）和刘强的关系交代

1. 68年元月份刘强向我要了一只小鸡，（价7角5分），我没有收钱，以后他就送了1斤半面条作为交换。此外，我没有在他家吃过饭菜，他也没来我家吃过饭菜。但我现在认识到，我与刘强互相送东西往来，这就是我的大错误，现在根据揭露，证实了刘强是一个反三红（注：“三红”指“无产阶级司令部”、解放军、新生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反三红”又叫“矛头三指向”，是当时给“五一六”定的罪名）的反革命分子和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可是我以前和他送礼来往，勾勾搭搭，这就说明了我是个没有改造好的右派分子。

2. 68年上半年，我经常到刘强家去，向他汇报班内生产情况和提出建议。同时，刘强在生产上也是比较相信我，七月份以后，我因要求调班，刘强没有同意，我有些意见，去他家次数就比较少了。9月份刘强没有搞服务班子后（没有进领导班子），我便很少去刘强家了，刘强更是很少到我家。

以上主要是我和刘强来往的主要情况交代。

为什么我要送小鸡给刘强，为什么我那么积极地向刘强提出生产安排上的意见，检查我的主要思想根源是：以前看到刘强在大联好像很吃得开，又经常听到他自吹自擂是个革命干部，联想到大联可能在九队掌权，我在物资上和生产上讨

好刘强，以后在清理阶级队伍时，刘强就可以说我几句好话，保我过关，这就是我的思想实质。也是我所犯的罪过之一。

3. 经过我的检查回忆，在政治上有关文化大革命方面，我和刘强是没有什么联系的，在文化大革命镇压造反派，刘强从来没有事前和我单独谈过，也没有要我开过有关核心小组会议。我平常在他家也很少交谈队上文化大革命情况，我在他家除提出生产讨论生产方面外，其它很少在一起闲谈，打扑克，这些可以经得革命群众调查。

68年7、8两个月，刘强在班长会议上布置各班自行考勤，并说，考勤要认真些，我就执行了他的指示。在考勤时，在考勤表的反面就详细地写了全班（包括我自己）每人每天具体干的活和时间，并在月底把全班全月实际生产的时间作了统计。这样作，刘强是支持我的，并在会上还表扬了我。在交考勤表时，还附带向刘强汇报了刘开明同志在生产时间内经常和别人扯谈的事。这样，我实际上迫害了刘开明同志。

（六）.和走资派文家树关系的交代

68年2月份，我曾向文家树老婆刘秀英借了70元钱，电汇回家作我爱人来队的路费（在二季度分两次还了），以后我带刘秀英买了20个鸡蛋。在生产上我和刘秀英在一个班，我安排生产时也照顾了她（没有要她挑粪挖土）。

我和文家树本人很少讲话。

我为什么会向刘秀英借钱，和走资派勾勾搭搭呢？主要是我的右派思想没有改造好，因此对走资派不恨，思想界限不清，就是说，思想上同流合污，因此才会向走资派借钱，这个事实也说明了我是个没有改造好的右派分子，这是我的大错，我向毛主席请罪。

（七）以生产压革命，镇压革命造反派

1. 文化大革命以来，我只是埋头搞生产，不但自己不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而且还阻止了其他个别同志的革命串联。如我在一班时，刘开明同志有时

在生产时间内和其他同志谈话，我就提意见说：“要用业余时间闹革命，不应该在生产时间内扯谈”，这实际上就是我阻止刘开明同志的革命串联，这是我以生产压革命的一个例子。

在 68 年 7 月份，我有向刘强说“刘开明在生产时间内和别人扯谈，我是提了意见的，将来提意见多了，他便会对我有意见，我怕他将来报复我，不如早走，还可避免更大意见。因此我要求调三班，如不调三班，则要求调回后勤去”。以后我又找干部科要求几次调回后勤，最后刘强就同意了我的意见说，到下次换班时，把你调离一班。

我要求调离一班，是逃避刘开明同志对我以生产压革命的斗争，实质上是我以生产压革命的翻版。

2. 68 年 6 月份，有一次我因没有很好地照顾郝利民同志的休息，当时，郝利民同志批评了我，以后，我就向刘强汇报了经过，并说：“我就不愿受他（指郝）的气话，我要求调回三班。”当时在生产上刘强是相信我的，我这样说，实质上就是排挤和压制郝利民同志，而郝利民同志是八二三革命派，这样，我也就是镇压了八二三革命派，这里，我再次向郝利民同志真诚道歉。

3. 68 年 7 月份，有一次赵福来同志对我说：“选刘强作服务班子，选举时也没有通知我，我没有参加选举，我不知道，因此，我就不承认它。”

在此之前，刘强的服务班子是大联一派单选举的，造反派不承认它完全正确。但是我在听到后，就把原话告诉了刘强。现在检查起来，我的这种作法，实际上就会引起刘强对赵福来同志不满，势必会对赵福来同志施加压力。

赵福来同志是八.二三革命造反派，这是我犯下的挑动干群关系的又一滔天罪行。

4. 68 年元月份，有一天早早上班时，我找赵福来同志爱人要柴刀，态度十分恶劣，言语十分生硬，并且未经同意，擅自跑到老赵屋内找刀，我这种欺压人的恶劣作法是十分错误的。虽然外表上是与他爱人吵闹，但实际上是欺压了赵福来，而赵福来同志是八.二三革命派，这样我也就是镇压了革命派。这是我所犯下的又一罪行。我向赵福来同志真诚道歉。

5. 68 年 9 月份农业队斗易祖德时，我打了易祖德一下。

现在检查认识到，农业队当时是以斗易祖德为名，行镇压革命派之实，我参

加了这一活动，打了易祖德，也就是镇压了革命派。我是一个右派分子，应该老老实实，不得乱说乱动，可是我却动手打人，镇压革命造反派，我真是罪该万死。

以上是我以生产压革命，镇压八.二三革命造反派，我所犯的一连串罪行的交代。

从以上罪行可以看出，我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以生产压革命，镇压了革命派，以恶劣的态度，生硬的语言，发展到打人，都充分说明了我的猖狂和不老实。以上罪行，完全说明了我是一个没有改造好的右派分子，我完全认罪，我甘愿接受革命群众对我的批判，甘愿接受任何专政处分，我犯下了滔天大罪。

我向毛主席请罪，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请罪，向革命群众低头认罪。

胡应强 3.2. 交代 下页待续

最高指示

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

认罪书 胡应强

首先，我向毛主席请罪。

（五）我攻击革命派的言行罪恶的交代。

1. 68年6月份我对郑春华说过：“革联站好是好，但是家庭出身成分不好的子女多，知识分子多”。我现在检查认识到，我的这种说法是极端错误的。因为衡量一个革命派的标准，不是以其中个别人家庭出身成分好坏来衡量的，而是看谁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衡量的。我的这种说法，实际上是混淆阶级斗争阵线，模糊队上两条路线斗争的实质，我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以血统论攻击了我队革命造反派。

2. 68年6月份，我曾说过：“革联站就是会搞宣传工作，如许得华一有空就和别人宣传革联的路线如何正确，袁有庆听了他的话才参加革联的，在这方面，大联就不行。”现在我检查，我说这些话，实质上就是挑动大联也大搞宣传工作，以镇压八.二三革命派，这是我犯下的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行。

3. 68年8月上旬，我申请参加大联的说法是错误的。我说：“过去我认为革联站是一派，是革命的组织，现在王良才骂宣传毛泽东思想是宣传鸡巴毛，大家都认为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可是革联站却去保他，这说明革联站不是真正的革命组织，因此我现在申请参加大联”。现在事实说明：7.31是毕成之流及一小撮阶级敌人蒙蔽和挑动炮联委部分群众对王良才同志进行的政治迫害，籍以镇压“八.二三”革命派，达到一派掌权，在红山搞独立王国，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的阴谋。因此我的申请是攻击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言行。

以上事实，说明了我是在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肆意攻击了革命派，这是我所犯的罪行之一，我向毛主席请罪，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请罪。

3月2日

最高指示

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

认罪书 胡应强

先我向毛主席请罪。继续交代我的罪行如下：

（八）企图为右派翻案的言行：

1. 68年3月上旬在一次挖土时，我和高望春同志说：“我以前用业余时间学农业，在58年反右时还受了批判，批判我不安心工作，想回农村搞单干，走资本主义自发道路。58年以后，我一直是搞供应工作，以前我以为农业是空学了，想不到现在意外地能为公家种菜，过去所学的知识又用上了。”当时说话的总意思和表情是为自己能学以致用而高兴。现在检查：我是以过去农业没有空学为藉口，把学农业与反右连起来，我的话里就包含了为自己右派翻案的意思在内，影射为自己右派翻案，这是我为右派翻案的罪行之一。

2. 68年2季度，有一次我和周望保同志说：“文化革命以前，我的脾气非常坏，态度粗暴，言语生硬，动不动就和别人吵起来，因此，得罪了人，在文化

大革命中有人就写大字报报复我。”现在检查我的话完全是哄骗人的假话，长期以来，由于我的右派反动思想没有改造好，它就必然地要在工作作风，言语行动中表现出来，我为了掩盖自己反动思想的实质，把别人揭发我的大字报，反诬是报复我。以此骗人。这就说明我不愿检查自己右派反动思想，不承认自己的错误，这是我为右派翻案的另一种表现。

3. 69年2月14号在一次班批判会上，我说：“我没有为右派翻案，革命群众对我的批判我还认识不到，请革命群众对我进一步批判。”现在检查，我以上的话是十分反动的，我抗拒了革命群众根据事实对我的批判，不敢承认自己为右派翻了案，也就是不承认自己右派反动思想的罪恶实质，这实际上就是为右派翻案，是我学习以来所犯的新罪行之一。以上事实，充分说明了我是犯了企图为右派翻案罪行的，我完全老实甘心接受群众对我的批判，把我的右派思想批深批透，使我的右派反动思想永世不得翻身翻案，我完全认罪。我向毛主席请罪，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请罪，向革命群众低头认罪。

下面待续，继续交代 3.6

【故纸堆】

一个“四类分子”的投案请罪书

任冬林整理

说明：写请罪书人周喜春（化名），湖南城镇居民，“四类分子”（坏分子）。

四类分子周喜春，现年68岁，贫民成分，个人出身工人，系湖南省平江县人。

从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他老人家，提出的英明指示说，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的号召，我听了这一伟大教导，我是一个四类分子，我就老老实实，不乱说乱动的接受革命群众的监督，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几年来，我没有搞过坏事。

69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提出的四类分子遣送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使改过立功，从新做人，可是我相反违背了老人家的这一伟大教导，

胆大包天，目无法律，到处流窜，破坏了社会秩序和社会治安。

①我在1969年时，四类分子遣送，我就乘机搞鬼。贫下中农干部易喜珍来我家找我诊眼睛，我就找她商量，要求到她湖北监利县尺八区盐船公社去，要她批准我去她该地落户。我想那里政治比较得要松，生活条件要高，个人收入也就会要好，专门追求在资产阶级的个人吃穿用的方面。由于认识不正确，位置没有摆正，加之又是以私人关系，打上一个许可证给我，搞我过去的。经大队干部和上级讨论我的落户时，不能取得同意和上级的批准时，我思想上就来了一个激烈的斗争，怎么办呢，回去怕迁移户口已下落了，政府再也不会许可了，回家怕婆婆（老婆）、姑娘、子、媳都不理我的，到哪里又能解决我的生活问题，年纪已六、七十岁了，病也多，反正活的时间也不会太久了的，想做好的搞，也无有条件，想改造好来报答毛主席和党，也做不到了，想子孙后代不受我的牵连，也不可能了。斗来斗去，没有办法，无路可走，只好横下了一条心，听来，过去一天算一天，只好为了自己的生活来过着一种无靠的非法生活，因此就单干诊病，搞一餐吃一餐，这样的过几年。一年一年来，社会在前进，人民的觉悟逐渐的提高，医疗制度的优越性治病，也就是集体治疗，我也就更无办法了，只好将自己的衣服被子也卖光吃掉了，还是不能得到解决，只好就开始到处流浪。我这次去韶山的原因。一个是听说，毛主席故乡参观的人多，热闹，什么都很好。加之，我久已就念念着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由于我没有听他老人家的话，犯了错误，犯了罪，只怪我自己没有帮党和毛主席争气，帮我父母争光，我一生无法看到我们英明领袖毛主席，我去看看他老人家的家乡，来尽我对毛主席的热爱，我死也心甘。特别是我这次在韶山患高血压病死去七天之久的时间，不是我们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英明政策，还不惜任何代价，从人力、物力和经济力各方面来对我的照顾，我哪有回××的今天。我只有自动投案守法的一条，来好好改造自己，从（重）新做人，再立新功来报答我们伟大的英明的正确的领袖毛主席、共产党，坚决不能中反革命分子和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滥计来投河自杀，（用）死与党和人民为敌，捏造（破坏）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我从现在起，保证坚决听毛主席的话，听共产党的话，听领导的话，好好改

造自己，坚决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来，我要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航道前进。情愿改造一辈子，再也决不愿意过着资产阶级的腐朽生活一时了，要做到海枯石烂不变心，要战胜糖衣炮弹再立功，口口声声怨自己，千言高呼感谢毛主席、共产党。

犯罪人：周喜春 1971 年 4 月 28 日

【编读往来】

1、阎长贵谈陆小宝文

陆小宝先生《怎样理解“剥洋葱”》一文两次使用了“编排”一词（本期《记忆》第 34 页第 3 段）——“编排”和“编派”是不同的两个词，此处似应用“编派”，请酌。

借此我想顺便说件事情。我读过陆小宝先生一些关于文革的文章，我觉得他是很有思想的一个人，认识很深刻。记得他曾说过，认真和如实地回忆文革经历把它写出来是“我们这一代人最后的历史责任”。最近看到王海光先生给徐海亮先生《武汉“七二〇”事件实录》一书写序言《武汉“文革”的口碑历史》中把“……最后的历史责任”一语说成我的话；这不对，我虽说过类似意思，但我没有这样明确的语言。当我最初看到陆小宝先生这句话的时候，就觉得很受启发，认为这是对经历过文革一代人的希望和要求。

2、蒋健谈《回味“九一三”》和《康生的另一面》

《记忆》68 期程光《回味“九一三”》一文中提到其父亲邱会作的一个说法：“王洪文说，对我们的最后处理决定，不仅中央全会没有开，毛主席本人也不知道。‘十大’以后，毛主席提出了对原来任过政治局委员的，凡没有定下是‘反革命’的一律养起来，中央组织部门提出了每月发二百元钱生活费的大概方案。在一次中央的会议上议及到这个问题时，毛主席说：‘黄、吴、李、邱几个人没做结论，这样安置比较好。’因为没人敢露出真情，会场上的人很紧张，冷场了很久，汪东兴硬着头皮向毛主席说：‘对黄、吴、李、邱、李雪峰在十大前已作

了结论，开除党籍了……’毛主席听了很惊讶，足有几分钟瞪着眼睛没有说一句话，大家吓得不敢吭气。”

而《党史博览》2008年第5期，纪坡民在《回忆李雪峰和我父亲的一段往事》一文中提到其父亲纪登奎的另一个说法：“1973年党的十大前，林彪的专案审查工作结案，李雪峰和黄、吴、李、邱一起被开除了党籍，也是我父亲向毛主席汇报以后决定、并经手办理的。”“1973年，林彪事件审查结案，我父亲和周总理、叶帅一道去向毛主席汇报。在谈到林彪事件涉案人员的处理意见时，我父亲向毛主席提议：‘李雪峰、郑维山两位，同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位大将的问题不一样，处理上也应当有区别，建议不要开除党籍了。’谁知毛主席听了以后，高深莫测地说：‘纪登奎呀，你这个人啊，少两根白头发。不像我们这些人。’关于毛主席这段话，我听父亲讲过好几次。他打着手势，讲得绘声绘色，很生动，给我的印象很深。父亲解释说，毛主席这个话，听起来好像是开玩笑，实际上是批评他的。意思是，你纪登奎阅历太少，政治上幼稚、不成熟。而且，这番话，也就表示毛主席驳回了关于李雪峰不开除党籍的提议。就这样，李雪峰被开除了党籍。”

按照纪登奎的说法，毛泽东连李雪峰的党籍都要开除，遑论“四大金刚”！那么，邱会作的说法与纪登奎的说法哪种更可信呢？个人以为，纪登奎的说法更可信。因为纪登奎是当时负责“林彪专案组”日常工作的人，而且有李雪峰为佐证；邱会作只是在牢狱中听王洪文的转述，迄今为止没有任何旁证。

另外，程光文中提到的“五名政治局委员组成的工作机构开除包括党的唯一的副主席和其他八名政治局委员”的说法也不够确切，起码他多算了一个人，而确切的说法应该是“开除包括党的唯一的副主席和其他六名政治局委员及一名政治局候补委员”。

另外：我想给余汝信《康生的另一面》一文做两点补充——

一、康生之子张子石一直在山东省做省委常委，但1975年7月却调任杭州市委第一书记、革命委员会主任，同时兼任浙江省委常委、浙江省革委会副主任。而谭启龙1972年4月至1973年5月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浙江省革委会副主任，1973年5月至1977年2月任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浙江省革委会主任，其间还曾兼任浙江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据一位知情的友人说，

当时是谭启龙亲自点名要求张子石出任杭州市一把手，如果此事属实，可见谭启龙当年是领康生的搭救之情的。

二、康生对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人文工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红旗公社、全总机关《国际红旗》公社等四个组织主办的“红旗”第一期上发表的《揪出反革命两面派刘宁一》一文表示反对，他在该标题前面打了个大问号，并有如下批语：

刘宁一同志不是反党反毛主席反社会主义的三反分子，他不是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把刘宁一同志诬蔑为反革命分子，并且到处散发，这是完全错误的，是别有用心的。刘宁一同志不是“三和一少”路线的制定者，相反，宁一同志是首先揭露和反对“三和一少”的人。此报诬蔑宁一同志是“三和一少”路线的制定者和忠实执行者”，这完全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是替真正制定“三和一少”的人打掩护。

此报盗用《红旗》党刊主席的题字，作此报的报头，制造混乱，鱼目混珠。我将这些意见写给了富春同志，富春同志已写信给全总写这篇文章的四个组织。信的内容可问富春同志。

康生

一九六七年三月八日

3、吕正谈 67 期林达的文章

《记忆》第 67 期转载林达的《已经消失的中国“犹太人群体”》使我震撼。

将“黑四类”比作“犹太人群体”再恰当不过了，这就是说，按阶级和政治态度杀人，同灭绝种族杀人一样，是反人类的罪行。对“黑四类”和他们的后人加以批斗、体罚、囚禁、管制、歧视，同纳粹集中营一样，是反人性的法西斯暴行。掠夺瓜分地主阶级的动产、不动产甚至他们的女人，（也包括后来名为“改造”实则“共产”吃掉资本家、手工业者和农民的资产和土地），都是对人类文明发展史的颠覆和嘲弄。

感谢林达将“黑四类”问题提到了应有的高度。尤其高明的是把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革的各阶层受难者同“黑四类”的受难作了联系和比较，把各类受难

者获得改错平反同“黑四类”摘帽也作了对比，揭露出“黑四类”是我们国家民族与生俱来的天然敌人之奇冤。数十年来各种政治运动的受害受难者，都有不同程度的呼喊和反抗，也不同程度得到统治者或体制外阶层的反正、同情和抚慰。唯有“黑四类”成了“铁案”，无人触碰，数千万同胞蒙冤受屈，却像泥牛入海无声无息，默然逝去，中华民族岂不悲哀复耻辱！

号称泱泱文明大国，为何至今不见任何掌权者（尤其是其中的开明者、改革派）和社会知名大家挺身而出点评剖析？看来有两个方面的障碍：一方面，“阶级斗争”理论这棵毒树在神州大地根深叶茂，几乎全民吃下了毒果；另一方面，要是从根本上给“黑四类”平反正名，那就必然会撕下“红色革命”的“合理”外衣。冒此“天下之大不韪”，谁敢？谁愿？谁能？时至今日，犹太人兴旺发达、誉满全球，而“黑四类”消失殆尽、冤沉海底，真是天渊之别。可见：社会体制决定群体的命运。

林达揭出并鞭打了罪恶，但还是少了点全面的数据、典型和挖根寻源。当然，一篇文章承担不了那样多。“黑四类”群体纵然消失，但他们的后人和亿万同胞延绵永在，中华民族历史永存，大是大非不能不分。我很盼望有人像杨继绳写《墓碑》那样，把“黑四类”的遭遇和根源写出专著来。